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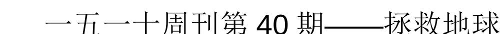



【编者的话】

连绵不绝笼罩京城的灰霾天再次引发了全民对生存环境的关注。自然孕育了人类，但人类在发展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向自然回“赠”以破坏和掠夺，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又反作用于人类自身，制约社会发展。梭罗曾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不仅要观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我们应该如何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公民可以如何参与环保事业？







本期周刊将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中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开篇的三个故事呈现中国的环境之殇。对于连日来京城的空气污染，官方一直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也未出台预警制度和治理办法，民间只好掀起热热闹闹的“自测行动”向官方施压，以冀其尽早发声。刘鉴强在梅里雪山深处找到了自己梦中的“香格里拉”——有着动听传说和迷人风景的雨崩村，同时却忧心忡忡地发现，“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让这片世外桃源的美景和原生态文化不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南京古城的记忆和象征之一，梧桐树在与城市化的交锋中败下阵来。每一条地铁的修建，意味着几百棵梧桐失去扎根的故土，甚至生命，也意味着南京人被剥夺了与自然亲近的乐趣。

环境遭遇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幸运的是，中国还有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为这片土地“疗伤”。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诚先生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身体力行，感召世人，在曾经荒漠般的公共生活中种下了一颗环保的种子，而如今绽放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年保玉则山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喇嘛，仅仅因为爱鸟，而画鸟，保护鸟，不仅成为了鸟类研究专家，还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一家生态保护 NGO。他们作为以人生践行环保的杰出公民代表，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环保的巨大潜力。

在“破坏”与“保护”的拉锯战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曲格平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文明的兴衰与人类和自然的互动休戚相关——人类的文明若想走向光辉的彼岸，就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同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

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在当今中国，还有制度性的障碍横亘在公众和环保事业之间。张兢兢律师在分析近几年来发生的四个环境公众参与事件时发现，虽然公众参与助力事件的发展和成功解决，但仍具有滞后性，被动性，并且缺乏科学的程序性规定以及法律救济，这些特点减弱了中国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动力。她呼吁政府提高环境法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力度，并与公众共享环境信息，而法院为环保团体和公众打开大门，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环境问题为社会带来的风险。



本期周刊的最后，我们为您介绍台湾地区和日本如何开展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三十年来，台湾绵延不断的环保运动经历了“保卫家园的悲情抗争”到“社区营造的细水流长”，并且作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推力，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公民们也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接受了一堂堂生动的环保课程，从而保证了环保运动不断地焕发勃勃生机。而日本公民“洁癖”的养成，得益于环境教育的深入普及，它让善待自然的观念根植于孩子们的内心。另外，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帮助日本公民养成了良好的环保习惯，还促使环保成为一种人人推崇的文化，一种“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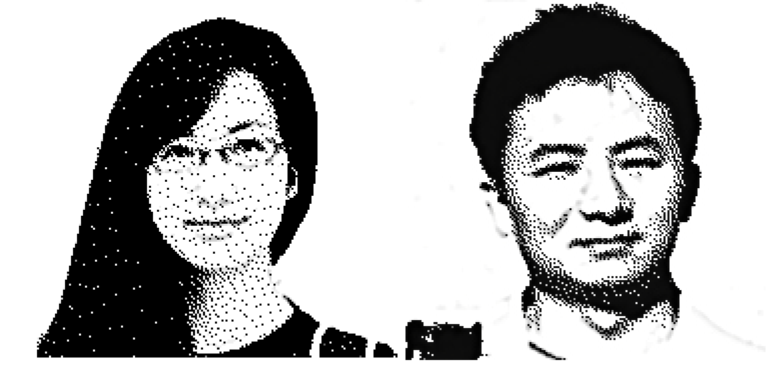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殇】

9-1 冯洁吕宗恕：我为祖国测空气



“最近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如同‘轻度追尾’令人捉摸不透。官方和民间的感受一如既往地缺乏共鸣，环保 NGO 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 PM2.5，通过网络发布民间信息。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坚毅中带点无奈。”

整个十月，北京几乎面如土色。

北京市民王海燕有时会很绝望：“我是不是不该生孩子？”国庆之后，她特地向儿子的幼儿园告假一个月，打算趁着秋高气爽让孩子体验户外游玩，然而如今一家人只能闷在家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灰霾连绵不绝笼罩京城，没有官方预警，也没有事后解释。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反复跳上 200 大关，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非常不健康”、“危险”级别。

尽管美国大使馆小心翼翼在官网解释：“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但是每个北京市民都能闻到空气中呛鼻的灰尘味，视野不远处笼罩在灰霾中的高楼如同海市蜃楼。

最近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如同“轻度追尾”令人捉摸不透。官方和民间的感受一如既往地缺乏共鸣，环保 NGO 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

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 PM2.5，通过网络发布民间信息。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坚毅中带点无奈。

自己拿起检测器

王海燕在一家出版社工作，2011 年 7 月，她成了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检测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2011 年上半年，达尔问开始招募志愿者，测试室内甲醛浓度。达尔文创办者之一冯永锋说，既然官方数据千呼万唤不出来，那么民间自测 PM2.5 总可以的。

2011 年 7 月 18 日，王海燕带着检测器，上了公交车，从位于南三环的家到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工作单位，又走进了十间办公室。

在办公室，同事们很好奇，有人想借仪器回家测，有人打算买一台自用，也有人毫不在意，在抽完一支烟后，滔滔不绝说："污染是地球发展的必由之路，你们阻挡不了。"

她暗想，以后有一天她或许得对儿子说，孩子，戴好防毒面具再出门。

王海燕一天自测的结果发现，上午空气中的颗粒物普遍比下午少，有烟尘排放源的场所（如吸烟室、烤羊肉串摊）颗粒物明显增多，而空调公交车比非空公交车干净，地铁比马路上颗粒物少点但又比空调公交多。

她在空气质量日记里写道："以上结果看出，只有空调车内的空气偶尔达到美国人'优'的标准。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国标的健康空气和美国的不健康空气中。"

在北京最灰暗的那几天里，LG 商品企业部经理刘昌峰突然忆起两个朋友，夫妻俩在日本大地震的三天后回国避难。不料在北京住了三个月，双双得了支气管炎。久治不愈，不得已又返

回核辐射威胁下的日本。

刘昌峰也成了达尔问自测队伍中的一员。在这次自测行动中，除了达尔问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位普通市民。“我们的检测结果和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差不多，”达尔问工作人员王秋霞说，“空气污染指数远高于官方公布。”

除了民间组织，商界精英和意见领袖也加入到这场自测行动中。

2011 年 10 月 22 日晚 11 点多，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在微博上贴了张 iPad 截图，在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大使馆院内，细颗粒物（PM2.5）指数为 439，评级为“有毒害”。潘惊呼一声：“妈呀！有毒害！”

两天内，这张截图转发近五千次。不少网友按图索骥，找到了苹果商店上一款名为“Beijing Air Quality”的软件。其数据来源正是美国大使馆。

手机插件还不过瘾，远大集团旗下的空气品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继说，能测试空气质量的“远大生命手机”有望下个月在全国上市。这种手机能监测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

“这种手机监测空气质量的功能还没得到相关计量部门的认证，但不影响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自我评价和判断。”彭继说。

早在几年前，远大老总张跃就已开始自测所到城市的空气质量。他常年随身携带一个十斤重的小包，里面装着监测颗粒物、甲醛等污染物的五六种仪器，由此记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能测空气质量的手机，正是张的突发奇想。

“好事者”众

国庆长假，北京媒体人梁立（化名）开车从湖北襄樊返京，一千多公里的路上，能见度不到一公里。他一路始终开着雾灯、打着双闪，“感觉被闷在一个箱子里，却怎么都走不出来”。

在天津，市民也闻得到空气中呛人的味道。2011 年 10 月 21 日，北京灰霾好转，广州又无可救药地迎来入秋后首场灰霾。

这场民间自测行动，不惟北京，全国不少地方的市民都在参与。

2009 年叶泉山还是中山大学本科生时，主持一个摄像头监控天气的小项目。他和同学发现，在 8 公里外的大学城遥望广州电视塔“小蛮腰”，大概有 1／3 到 1／2 的时间看不到。一般气象上认为，湿度 90％以下，能见度 10 公里以下，就算是灰霾天气。

在试验之后，叶泉山开始关注 PM2.5。

2010 年起，他依据官方公开信息，制作了一个每日自动更新的网页，命名为：“今天我们的空气质量真的‘优良’吗？”

PM10 和 PM2.5 的关系，被叶泉山比作“大苹果和小苹果”。对于大多数内地城市而言，PM10 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要污染物。而许多研究表明，PM10 和 PM2.5 空气浓度比例在 0.5 到 0.8 之间，因此只要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反推 PM10 的浓度，再乘以比值，就可以得出 PM2.5 估计值。

叶的网站正是以此进行估算。我国现行空气质量标准中没有包括 PM2.5，他希望通过公布经细颗粒物改正的空气污染指数估计，“让大家对身边的空气污染程度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民间自测科学吗？

达尔问在微博公布的结果很快遭到诸多专业质疑，比如现行空气质量最准确的检测方式是膜式称重法，需要经历捕捉颗粒、晾晒、称重、分析等步骤，而便携仪受温度、湿度的干扰较大，准确性存疑。

2011 年 10 月上旬，王秋霞频繁拜访了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专家，咨询如何提高测试准确性。

其中一名专家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他和同事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2004 年到 2006 年期间，潘小川在北大校园里设置了数个观测点，他们发现，当这些观测点的 PM2.5 日均浓度增加时，约 4 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急诊患者数量也会有所增加。

“虽然 PM10 和 PM2.5 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但显然后者的影响更大。”潘小川说。

其实，早在环保 NGO 和市民自测 PM2.5 之前，许多科研机构都做过小样本的调查。

1990 年代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工程师魏复盛曾参与了一项中美联合研究。他们在广州、兰州、武汉、重庆的城区和郊区各选了一所小学作为研究样本，并观测 1995 年至 1996 年间八所学校的 PM2.5 和 PM10 等数据。观测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美国 1997 年制定的 PM2.5 年均质量浓度推荐标准，八所学校全部超标，分别是美国标准的 3.8 至 10.7 倍。

2002 年，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黄鹂鸣等人在南京设了 5 个 PM2.5 和 PM10 的观测点，这五个地点分别代表交通主干道、居民区、商贸饮食、化工和旅游区五种城市功能区。若以我国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衡量 PM10，而以美国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衡量 PM2.5，则二者的超标率分别达到

72％和 92％，最高超标倍数达到 6.29 至 9.02。

然而，这些仅限于科研领域，最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自测数据。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大使馆在其院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 PM2.5 的浓度，并在 Twitter 网站上实时发布。严重时，美国大使馆用了“crazy bad”（糟得一塌糊涂）这一骇人词汇来形容。

这曾掀起一阵争议波澜。直至 2011 年 7 月，当达尔问开始自测并公布结果时，也遭到了同样质疑。在微博上，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回复众博友：“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在进步，有诸多的数据可以证明，不要仅拿某使馆的数据来说事儿。”

“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只能代表大使馆，代表不了北京。”一位多年研究大气污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说。

现在，达尔问的检测团队吸纳了环境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开始尽可能按照科学方法，记录监测点的环境气象数据、离主干道的距离等。“便携式检测仪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结果，得出报告。”王秋霞说。为了避免错误，她不再收录同期美国大使馆的检测数据。

“我们会少活几年？”

事实上，我国 PM2.5 监测和研究起步并不算晚。从 1980 年代的兰州光化学烟雾，到 1990 年代的南方酸雨，都曾涉足细颗粒物监测和研究。但直到 1990 年代末灰霾天气才增多，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还在二氧化硫等，细颗粒物尚未提上日程。

而传闻中的“监测能力不足，布点太少”一说也难以成立。以北京为例，北京在 2000 年后

有了较大规模的常规监测点。迄今，北京已密集布置了四十多个 PM2.5 监测点，只是从未发布结果。

2010 年，环保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呼声很高的 PM2.5 指标并未如期纳入强制性监测体系，而是作为制定和实施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参考污染物。

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在不包括 PM2.5 的空气污染指数下，全国 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 PM2.5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时期过渡标准，将其纳入修订中的新国标的话，城市的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 20％。

2011 年 9 月，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明确表示，要将 PM2.5 纳入修订中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而一位多次参加过标准修订会的专家也向南方周末证实，PM2.5 入国标已确定，“现在举棋不定的关键在要不要把 PM2.5 达标纳入政府考核。”

随着灰霾天气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不断增加，环保部门已在南京、上海、广州、长沙二十多个城市试点监测，无锡等地的气象台也在自购设备进行科研监测。

未在空气质量标准中纳入 PM2.5，却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试点监测，究其原因，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解释无非是“监测结果不太乐观，否则标准早就出台了”。

创新工场 CEO 李开复在微博上对潘石屹说：“算算这样的空气，我们会少活几年？”他还调侃说，“测 PM1000 好了，这样可以说北京有完美的空气。”

2011 年 10 月 23 日，新浪微博网友“黄城李记”发现，当日京城一场风雨彻底扭转了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惊人读数，从“危险”转至“中等”。“黄城李记”调侃道：“传说中的‘环保基本靠风’……谢谢风风雨雨。”

市民们不得不开始自卫。刘昌峰发现儿子卧室紧邻公路，成了全家细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地带。无奈之中，刘昌峰把家里布置成植物园，大大小小的绿植有近 30 盆，甚至还种了三棵 1.6 高的树，来吸附颗粒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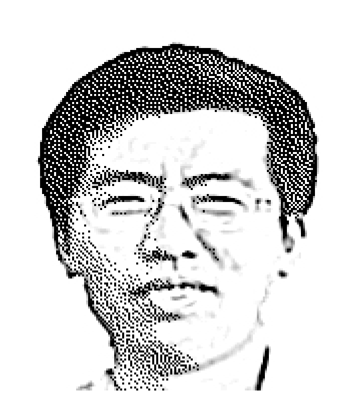
和大多数市民一样，刘昌峰继续自己的生活轨迹。他甚至不热衷于 PM2.5 入国标的事。只是他开始骑车时只用鼻呼吸，阴霾天尽量躲在室内。

注：PM2.5（Particulate Matter 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尽管民间呼声甚高，但中国尚未将 PM2.5 列入空气质量体系，通行的仍是 PM10 监测。

（冯洁，吕宗恕：《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4281）

【返回目录】

9-2 刘鉴强：消失中的香格里拉



“正因为藏民族有宗教信仰，才保护了这片原始森林，但当地政府显然没有充分肯定居民的贡献，在建了收费站后，便把门票收入拿走，居民分不到利益。政府对社区的基础建设投资也远远不够，特别是大山深处的雨崩村，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医疗，村民被迫与现代生活脱节，不但伤害了村民与政府间的信任，也造成对神山的破坏。”

前一阵子，我跋山涉水，费了好大劲，去寻找那传说中的“香格里拉”。等我终于到了那里，我很悲哀地发现，“香格里拉”似乎正在消失。

我先从北京飞了 2300 公里，到了云南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在的“香格里拉”县——这个地方原来叫“中甸”，为了吸引游客，当地政府把原名抛弃，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据为已有。这大概像许多演员嫌自己名字土气，于是改个很酷的艺名一样。

然后我再坐 10 个小时的汽车，顺着那条整修中尘土飞扬的山路，穿过干热的金沙江河谷，再爬过凉爽的白马雪山垭口，便到了北面的德钦县。这是云南最北边的一个县，再往北去，就是西藏了。

你可别以为这就到了“香格里拉”，还远着呢。我得乘车再绕大山，越过澜沧江，近两个小时后才来到卡瓦格博峰下。

卡瓦格博是梅里雪山的主峰，海拔 6740 米，是云南第一高峰。梅里雪山耸立于怒江与澜沧江大峡谷之间，海拔在 6000 米以上的山峰 13 座，称为“十三太子峰”。1922-1935 年，美国

人约瑟夫.洛克在美国发表文章，称卡瓦格博峰是“世界上最美的人”。1991 年中日登山队在这里几乎全军覆没，梅里雪山成为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处女峰。2005 年，《中国国家地理》将梅里雪山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之一，梅里澜沧江大峡谷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

自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 1933 年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了虚构的香格里拉，喜马拉雅山脉中的许多地方都被认为是他的灵感来源。我要找的“香格里拉”，便是几百年来隐藏在卡瓦格博深处的一个藏族小村子，名为“雨崩”。

要到这个村子，仍然不容易。人们或步行七、八小时，或骑马四五小时，攀登极为陡峭险峻的 9 公里山路，越过南宗垭口，然后抵达大山深处的雨崩村。

雨崩原來被称为藏在石头里看不见的村庄。在当地有个传说：很久以前，每年都有一个不知来历的人背着布口袋到外面的村庄借粮食。他从来不谈自己来自何方，人们感到很奇怪，有人就在他的粮食口袋上戳了个洞，尾随一路撒下的青稞，人们找到深山中的一块巨石，再也看不到青稞粒了。人们把石头搬开，眼前出现了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子，这就是雨崩。

但这回，我要寻找雨崩，不必跟着地上的青稞粒，只要顺着垃圾走就行了。路边的垃圾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塑料袋、食品袋、方便面碗、饲料罐、啤酒瓶，这些垃圾一路蜿蜒前行，直奔雨崩，那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到了途中的最高点南宗垭口，有几家雨崩村民经营的小商铺。一家商铺背后的密林中有奇怪的白色，我钻过密林去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说路上一路洒落的垃圾是游击队，这里就是集团军了——大面积白白的塑料垃圾堆在林中，触目惊心。

自从十几年前这里被外人发现，开展旅游，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成了旅游热点。因为旅游者日众，在此地留下大量垃圾。而这里至今尚未开通公路，所有货物和垃圾处理全凭马驮人背，所以垃圾处理成为这个小村庄的难题。

这里属于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在 2009 年 10 月之前，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此地，

他们设计了垃圾管理系统，雨崩村和沿途产生的垃圾，都由当地马帮负责。在路边，每隔 50 米，就可看到一个箩筐，上面写着名字，这就是那位村民的负责区域，他要把周围的垃圾捡拾干净，并由马驮到山外，再集中处理。国家公园管理局与社区联络紧密，鼓励村民自我管理，没花多少钱，垃圾却处理得很妥帖。

但 2009 年 10 月，当地政府一纸令下，这个“国家公园”由一家国营旅游公司来经营，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既缺乏运作经费，又没有管理经营权，省政府研究室研究报告说他们“管理职能被弱化，面临无所事事的尴尬局面，存在丧失管理职能的趋势。”

旅游公司接手后，每年拿出几万块钱雇佣村民处理垃圾。但经营公司不像管理局那样深入社区，与村民交流也不多，村民即便拿到钱，也不积极履约。村民认为，你旅游公司把门票钱全收走，又不给村民，垃圾处理自然是你公司的事，与我何干？

我们在傍晚到了神话般的雨崩村。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雨崩村极为贫困，但当它成为著名的景点后，村民牵马、办客栈，成为梅里雪山地区最富裕的乡村之一。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们称这里是真正的“香格里拉”了：雨崩人家门前的景色奢侈到令人嫉妒：只要抬头，几面都是雄伟的雪峰，在蓝天下闪着万年积雪的光芒。从走不到尽头的原始森林走过去，有神瀑、冰湖、高山牧场和壮美的峡谷。对藏民更重要的，是住在神山卡瓦格博的怀抱里，与莲花生大师修行洞为邻。这里有 35 户藏民，160 人，基本保留着传统的藏族文化。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是一妻多夫。

进得村子，处处可见客栈，正在新建的客栈也有好几家。有天晚上，我住到阿鹰布的“神瀑客栈”。阿鹰布兄弟二人的客栈规模较大，有二十来间客房，门前是一条小河，过了小桥，走过一大片牧场，远处就是原始森林，再往远处看，就是优美的神女雪峰了。神女峰如此清晰，简直就像站在阿鹰布家门前。

我经过阿鹰布的邻居家门前，发现这家人刚刚在门口宰杀了一头小牛。我问阿鹰布：“这里的人，难道可以在神山面前杀生吗？”

阿鹰布沉默了好久才说："这是一个外地人，他杀牛卖给承包客栈的昆明人。我自己从来没杀过牛，招待客人的肉，都是从外面买进来的。"

阿鹰布说，外来人到雨崩，只为赚钱，不尊重当地文化习俗，把不好的东西都带来了。

因为游客越来越多，客栈越建越多。这里不通公路，大宗建筑材料无法运进来，村民只好砍树盖房。雨崩也不通电，做饭、取暖、照明全凭烧柴，一个客栈有一个锅炉，一天就要烧掉 1000 斤柴，20 家客栈，一天就要烧两万斤。所以这两年森林砍伐严重。

游客一多，一天仅白色垃圾就一百多斤。村民不愿在神山前烧垃圾，而垃圾又运不出去，所以越积越多。

游客管理也成了大问题。2010 年十月假期，一天就有游客 500 人，每个游客在里面至少住两天，那么每天就有 1000 游客，驮马不够，床位不够，很多游客连杯开水都找不到。游客 2007 年"五一"假期，有外地游客在神瀑里洗澡，把衣服脱掉压在经幡上，大声喧哗，不料发生雪崩，致一死一伤。"如果有管理人员，有警示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阿鹰布说。

阿鹰布为这个村庄的未来忧心忡忡。以前村民们经常转神山，但现在为了多赚钱，慢慢的很少转山了。以前村民之间如亲戚、兄弟一般，现在有些人学了外面做生意的坏习惯，相互竞争、拆台，"五年下去，大家都成仇人了。"阿鹰布说。

他认为，必须加强对这个村庄旅游的管理，否则，"好好一个世外桃源，就变成另一个丽江古城了。"他说。丽江是不远处一个纳西族古镇，因过度的商业开发而失去原来的当地特色。丽江开发模式经常受到批评。

但他的忧虑似乎正变为现实。那条从机场通到这个县的公路，很快就要修好，完工之后，原来五、六个小时的车程（现在修路期间要更久），现在只需不到三个小时。那时，千千万万的游客，将向这个小村庄扑来。

雨崩村的藏民迫切需要电和一条公路，这是高山区，天气寒冷，没有电，取暖、烧开水，

一切全凭烧柴；没有路，建筑材料运不进来，盖房子也全靠木料，所以森林盗伐时有发生。

村民阿鹰布说，客栈保持合适的菜量特别困难。因为没有电，所以没有冰箱，菜怕坏掉，所以不敢买多，只好隔几天就徒步出山去县城买一次菜，他习惯了走山路，比游客快得多，可来回也要一整天。

当地政府迟迟不给通电通路，村民们很不高兴。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说，他们想保持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平衡。如果从遥远的山外把电引过来，线路会破坏森林，所以他们考察了雨崩的河流，觉得可以开发一个小型的水电站，既不大规模破坏环境，又解决用电困境；至于公路呢，他觉得还是不开的好，修路会伤害这里的环境与景观，"那就像在梅里雪山美丽的脸上添了一道伤疤。"他说，而且，他认为，如果修了公路，成千上万的游客将不可控制地涌进来。

他提出另一个方案：在不太伤害景观的地方修建一条索道以代替公路。索道既可运人，也可运进货物，运出垃圾。

但电和公路的方案只是在设想中。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局虽然想解决问题，但正如上篇文章中提到的，目前其权限不够。而当地县政府的意愿也不强，因为梅里雪山景区由州上的旅游公司管理，县里认为，既然州政府派出机构管理，那应该由这些机构来处理景区内的基础建设。但收门票的旅游公司是个企业，赢利是其主要目标，社区建设不是它的责任。于是，对雨崩村来说，来自政府的基础建设，似乎只有那个向游客收门票的管理站。当然，门票收入，村民是拿不到的。

在大山另一边的明永村，门票收入造成村民与旅游公司更大的矛盾。举世闻名的"明永冰川"就以这个村子为名。卡瓦格博峰覆盖着万年冰川，冰川从峰顶一直延伸到海拔 2700 米的明永村森林地带，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壮观和稀有的低纬度低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但现在冰川退缩的痕迹非常明显，明永人、旅游公司明永管理站的大扎西告诉我，冰川长度 11 公里，最近 10 年来大约消失了一公里。冰川融化的原因很难判断，人们倾向于用"气候变化"来解释。

如同雨崩村，明永冰川是梅里雪山旅游的另一处重要景点。冰川脚下的明永是个藏族村庄，全村 51 户，300 多人，家家户户为游客提供牵马上山服务。在前两年，每家每年差不多收入七、八万。但最近修路，从香格里拉机场到德钦开车要十来个小时，所以客人减少，收入剧跌。

旅游公司与明永村藏族百姓的矛盾此时凸显出来。百姓认为，景点的门票收入，应给世世代代居于此的百姓分成，实际上，旅游公司所收的 80 元门票中，有 5%是给当地政府的。但当地百姓从没见过这笔钱。

现在牵马的收入少了，村民更不满意，在过去的几个月，时常发生游人与当地人的纠纷。如果客人骑马上山，村民尚有收入；如果客人宁愿自己爬山两三小时去看冰川，村民就一分钱也赚不到。所以村民们在路口拦着，客人若是骑马，那么热情接待，105 元一位；如果不骑马，对不起，请您交 10 块钱进山费。

不骑马的客人可就不高兴了："我已交了 80 块门票钱，凭什么再要我 10 块钱？这不是打劫吗？"于是起了争执。村民不高兴，游客更不满意，10 块钱不多，但认为收得没道理，后来投诉不绝，当地政府来协调，不久前刚强制取消了这 10 块钱的收费，但无法让百姓心服：你们拿走了钱，凭什么让我们老百姓吃亏？

我骑马上山，两个小时后即可看到冰川了。观看冰川的木质阶梯年久失修，有些木板两边的钉子不起作用，若不小心，脚踩上去，板子会活动，楼梯那么陡，一旦踩滑，可就危险了。观景平台上的角角落落里有不少垃圾。

谈起这些事，大扎西一肚子不满意："基础设施老化了，没人去管，栈道没有人维修。电没人管、水没人管、泥石流没人管!这主要是政府造成的，因为他交给企业来经营梅里雪山，企业把它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钱拿走，不好的东西全留在这里，比如垃圾。"

滇西北是中国旅游最热的区域，这里有虎跳峡、玉龙雪山、泸沽湖、长江第一湾、老君山、普达措国家公园等，但最壮美、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有文化品质的，还是梅里雪山。究

其原因，一是大自然所赐，二是当地百姓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祖祖辈辈对梅里雪山的保护。

梅里雪山是全世界 6000 米以上唯一未被登山者征服的山峰。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此山，当地百姓强烈反对，对着卡瓦格博峰跪拜煨桑，祈请山神显圣，阻止这些不敬神山的外来者。后来暴雪突至，17 名登山者遇难。1996 年，日本登山队又来尝试，当地百姓在澜沧江桥上阻拦，表达强烈愤怒。此次登山又以失败告终。后当地政府尊重当地居民意愿，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将梅里雪山定为禁止攀登区域。

当地百姓自古以来有保护神山的传统。阿鹰布说，30 年前，乡政府计划在雨崩开一个伐木厂，砍伐神山树木，增加当地人收入。但老一辈乡人强烈反对，说宁愿穷得要饭，也不能破坏神山。

明永村居民大扎西说，神山对居民的护佑，祖祖辈辈都看得到：这里生态丰富，气候舒适，从来没有爆发过什么战争，没有遭受过很大的自然灾害，没有过传染病，居民幸福平安。

大扎西说，正因为藏民族有宗教信仰，才保护了这片原始森林，“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文化，梅里雪山早被砍光了。”

但当地政府显然没有充分肯定居民的贡献，在建了收费站后，便把门票收入拿走，居民分不到利益。政府对社区的基础建设投资也远远不够，特别是大山深处的雨崩村，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医疗，村民被迫与现代生活脱节，不但伤害了村民与政府间的信任，也造成对神山的破坏。

与保护生态、促进社区发展相比，当地掌握资源的人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向能带来经济收益的项目，甚至是破坏环境与生态的工程。

八月，云南媒体报道，梅里雪山所在的德钦县决定在雪山周边“打造 12 个人工湖泊，再现梅里雪山 13 峰风采，以满足游客和摄影发烧友观景的需求。”公众纷纷表示质疑，担心此举破坏环境。

几天后，我又收到位于梅里雪山外转经路上江坡村村民的呼吁书，信上说，江坡铁矿擅自进行露天开采，江坡村及周边 10 多个村子扬尘纷飞。由于剥离放炮的影响，部分房屋墙基、墙体开裂，直接影响村民的人身安全。矿业公司将废弃矿渣倾入澜沧江内，对沿江一线造成极大的水污染，“我们世代繁衍生息之地受到威胁，请愿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是梅里雪山面对的最大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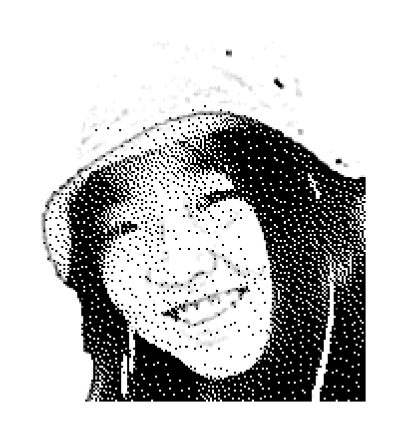
在雨崩呆了三天后，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山越爬越高，雨崩村越来越小，它在雪山之下，密林之中，显得那么神秘、美丽，充满和平的气息，像极了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我对它依依不舍，又为它怀着深深的忧虑：“等我下次再来，‘香格里拉’，你还在吗？”

（刘鉴强：《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518）

【返回目录】

9-3 贾冬婷：南京梧桐的死与生



“道路、高楼、地铁……一轮轮城市改造势不可挡。作为南京古城记忆和象征之一，梧桐树在步步退让中成为珍藏品。不是南京人也许很难体会这种为梧桐宁舍地铁的感情，但他们坚持：‘没有地铁或地铁绕道，南京还是南京。没有梧桐，南京不是南京。’”

“我看见太平北路被‘砍头’的梧桐树，一边走一边眼泪就下来了。”3 月 3 日，土生土长的南京姑娘周娴看到又一批梧桐树因修地铁要被移走，在微博上疾呼。她看到的这批树紧邻南京图书馆、江宁织造府、1912 街区和总统府，这 49 棵一人合抱的梧桐早已成为这片南京心脏区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想到漫天枝丫突兀地被砍去大半，只剩料峭春寒中光秃秃的树干。几天后，这 49 棵梧桐悄然迁走，街面一下子空空荡荡的。

这 49 棵梧桐只是第一批。因地铁 3 号线的修建，沿途将有 600 多棵大树被迫迁徙，包括 200 多棵 1952 到 1953 年栽种的梧桐。

“救救梧桐”的呼声于是逐渐沸腾。当地民间环保组织“南京绿石”负责人小白在 3 月初就开始关注梧桐的命运，她注意到，在 3 月 13 日晚拥有数百万“粉丝”的黄健翔的微博号召下，再加上孟非、陆川、台湾国民党中常委邱毅等一批知名人士的加入，网民一下子被点燃了。她随后加入“拯救南京梧桐树”线上活动，当时参加者已经过万。小白对本刊记者说，最让她感动的是，市民们自发为可能遭砍伐的梧桐树系上了绿丝带，或贴上“爱我古都，保卫梧桐”的车标，表达不舍之情。“绿丝带”在南京最早源于 2005 年的紫金山护树行动，紫金山

环保志愿大队队长刘光华对本刊记者说，那时候他号召志愿者们“找一棵树做朋友”，给它系上绿丝带——丝带虽然脆弱，但是一种美好而坚定的情感传递。后来他去南京的各中小学讲课，也将“绿丝带”故事告诉给孩子们，“找一棵喜欢的树，看护它，照顾它”。

“你不是一棵梧桐树，你和我们一样，是个南京人。”周娴在网上说，“小时候记得有那么多梧桐树，有那么大……夏天坐在妈妈自行车后面去外婆家，沿路的梧桐树荫浓密，偶尔会漏下来一两粒光斑，常常会伸手去接。”她说，南京的梧桐根本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代又一代南京人人生记忆中的一部分。

“南京人有几样东西不能动，排名第一的就是梧桐树。”南京作家崔曼莉说，她还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一条老街要砍树，所有电台、电视台的电话全部被打爆了，市民不能接受。“作为一个南京人，我太能体会在那么炎热的火炉之地走在遮天的绿荫下，对植物的感激之情。而且看见那么粗大的树干，就知道这是历史，是荣誉。”

“我 70 年代在林大上学做试验时就测量过，梧桐树下的气温要比阳光直射下的地方低四五摄氏度。”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庚国对本刊记者说。南京人都因此而自豪，“不要看我们南京热，出门都不用打伞”。这一“绿色隧道”景观壮美，“城市里是冠状修剪的，像一把伞，路两侧冠盖相接，可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而往中山陵去的大道上则是‘守灵树’，就向天上修建，树长得高耸笔直，像士兵一样，庄严肃穆”。

周娴说，20 年前，她在离家不远的石鼓路小学上学，小学操场上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她至今仍记得树上面铁皮标牌上的字：“古树名木，悬铃木，南京 001。”语文老师让他们在作文里写这棵树，体育老师则让他们手拉手围住这棵树。“那棵树好粗啊，要七八个小朋友才能围过来。”汤庚国教授证实，这棵树就是南京最老的梧桐树，这所小学原来是一座教堂的院子，1872 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这里种下了南京第一棵法国梧桐树。

不过，梧桐真正成为南京的象征，还是在 1928 年修建孙中山迎榇大道时。根据当时雄心勃勃的《首都计划》，南京作为现代化首都的骨架就是贯穿城北、城中、城东的中山大道，作为迎榇大道更有特殊意义——路宽 40 米，中间机动车道宽 10 米，两侧慢车道各宽 6 米，再外侧

人行道各 5 米，机动车道和慢车道之间设安全岛和林荫道，人行道边也植有林荫树。在选择行道树时，据说曾有几种方案，结果由时任南京第一任市长的刘纪文拍板选用了梧桐树。汤庚国说，时任总理陵园主任技师的傅焕光等几人专门去上海法租界采购梧桐种苗，“很多人习惯称之为法国梧桐，但其实是法国梧桐与美国梧桐的杂交树种，学名‘二球悬铃木’”。

傅焕光在在孙中山灵柩经过的中山码头、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东郊、中央路、中山南路，设计了“三板四带六排式”的行道树格局，在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旁种下两万多棵梧桐树，他为此颇为得意地赋诗一首：“十里梧桐归我栽，如盖亭亭左右开。隔尽尘俗都不见，游人信步好徘徊。”汤庚国告诉本刊记者，梧桐树自此成为南京最主要的“基调树种”，作为“世界行道树之王”，它易成活，耐修剪，其大叶片的遮荫滞尘作用是其他行道树所不能比拟的。在 1953 年又一轮种植热潮过后，南京十几条林荫道上都栽植了梧桐树，总数达 10 万多棵。

如今，经过 90 年代以来的历次城市改造，民国时期栽种的两万多棵梧桐树只剩下不到 3000 棵。汤庚国很惋惜：“当年中山路上的 6 排梧桐树是世界闻名的，可现在却只剩下零碎的两排了。现在如果想感受民国大树，只能到陵园路上看看了……”

当梧桐遭遇地铁

地铁 3 号线已经箭在弦上。在南京地铁公司总经理佘才高眼中，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地下大动脉，连接主城、江北新市区和东山新市区，再加上 2014 年“青奥会”召开，他们的建设压力陡增。目前 3 号线 60%已经开工，没有开工的都集中在从夫子庙到市政府的主城区段，地下是古秦淮河道，地上是交通主干道，施工时要兼顾道路交通、地下管线、周边绿化，佘才高说，这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地铁的一大拦路虎是树。比如在沿线的太平南路，干道两边每隔 10 米左右就是一棵梧桐，

这些成年大树的枝干几乎遮住大部分路面，可以想像开春后枝繁叶茂的浓荫。还有太平北路，那是 60 年代形成的南京首条景观路，水杉、薄荷山核桃等层层递进。特别是水杉，号称“植物活化石”。汤庚国说，还是当年他老师的老师、南林大校长郑万钧发现和命名的，后从学校培育成功后搬去太平北路，在路两侧永远笔直高耸，人气非常高。

南京市城管局绿化管理处副处长臧廷亮解释，修地铁有两种情况需要移树，一是站台结构施工，需要将上面所有的覆土、绿化、杆管线迁移；二是交通疏解需要，由于地铁施工需要封闭部分交通，有的行道树影响到交通疏解，也要移植。这样算来，3 号线除市政府站和浮桥站外，其余 11 个站点要移走树木 600 多株，涉及梧桐、香樟、臭椿、高杆女贞、栾树等品种。

在南京人特殊的“梧桐情结”下，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说，要移的树已经减了又减。比如迟迟未定的浮桥站，倾向于将站台开挖由路一侧移到路中，这样可以少迁移 188 棵树，但代价是站台从原来的 12 米缩减为 11 米，施工工效降低 20%，而且会影响施工时的后续交通。而水杉集中的市政府站则弄出了 4 套方案。留树的成本巨大，水杉的存活是一个问题，另外沿线房屋都要加固，为了保护树就要增加 1 亿元的成本。

南京人相信，总还有兼顾“保大树、保交通”的更优方案。这信念来自于 2006 年地铁 2 号线的记忆，因为 2 号线途径“民国梧桐”所在的中山路沿线，迁移的行道树数量一再缩减，从最初的 1065 棵，缩减到 780 棵，再到 328 棵，最终迁移 190 棵。和最初的迁移方案相比，实际树木迁移量减少了 82%。这其中的“水分”是怎么挤干的呢？曾参与地铁 2 号线设计的一位南京地铁部门专家透露，刚开始，是缩减施工场地面积；后来，针对具体车站逐一方案优化。例如当时的上海路站和苜蓿园站，施工场地都是偏于一侧，减少了几十棵大树的迁移。大行宫站和明故宫站，则是和周边的学校和产权单位协商拆除围墙等，绕开大树建立临时通道。为了少移树，工程投资成本也增加了近 5000 万元。汤庚国觉得再大的代价也值得，移与不移差别显着，“比如 2 号线争议最大的明故宫站调整方案后保下了文物和大树，军区总医院站台附近则光秃秃一片了”。

这早已不是梧桐树遭受的第一次浩劫。汤庚国说，这次 3 号线地铁经过的太平南路商业

街，90 年代中期为把沿街店铺全部露出来，采取“亮化行动”，把一条路上的梧桐树次枝全部砍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亮化目的达到了，可树元气大伤，10 年了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且很大一部分大树后来都枯死了。

更大的牺牲是因为路。1990 年以来，随着南京汽车量以每年 15%的速度递增，原来显得非常宽阔的民国大道不够用了。因此在 1993 年将中山南路的 4 排大树砍成两排，快车道向自行车道与人行道扩张。接着，中央路与中山北路的 4 排大树也被砍掉两排，快车道得以抢占人行道增宽至六车道。为了沪宁高速公路从中山门进城，南京东郊砍去了城门口的大树，从中山东路至中山陵的百年绿树陵道被硬生生中断。从中山码头至中山门一路数去，就少了 3000 多棵“民国梧桐”。

1998 年，杨涛刚从东南大学调任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今南京城交院有限责任公司)所长，就碰到了“中山东路扩容”这个烫手山芋。他对本刊记者说，当时这条路机动车道只有 12 米宽，3 个车道，只相当于一条支路，却要承担一条特大城市主干道的作用，“就像 10 岁的小孩要挑 100 斤的担子”。一开始的方案和中山路一样，把中间 4 排树砍掉，“三块板”改成“一块板”，三车道变六车道。但是这种做法太简单粗暴，而且未必奏效，六车道的路段和路口通行能力无法匹配。他们做了详细调研，将沿途 900 多棵树一一标出，提出应该保留“三块板”的断面，最大通行能力扩大为四车道，路口做一些渠化，打通交叉口的通行制约。后来中山东路方案依此进行，遗憾的是，梧桐树还是从六排减为四排。“在 1929 年《首都计划》制订时，南京市的机动车只有 280 辆，当时红线是 35 米到 40 米。当年规划师说，现在这条路不必修那么宽，只修建半幅就够了，不过将来‘必不敷用’，可能还不够宽。怎么办？就采取多栽树的方式，两侧栽了 6 排树，用意就是将来交通量大了，可以把树移掉，把道路拓宽。”杨涛说，虽说前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不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中山东路和 6 排梧桐树，早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符号，任何变动都要小心谨慎。

“扩路只是权宜之计，并不希望大量机动车进入到老城中心来，长远看，还要靠交通方式的调整和城市结构的改变。”杨涛认为，地铁是疏解老城交通压力、保护文物古迹的根本解决方案，南京的修建已经有点晚了。他指出，地铁线路和出入口大小是根据交通需求测算出的，

如果一味为了保树而有意削减地铁出入口，那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而在 3 号线之后，南京还有 14 条地铁线待建，即将密集穿越古城地下。

古城保护和地铁之间的交锋不仅是梧桐树。持续关注南京古城保护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姚远担心，3 号线因受制于秦淮河古河道而采取的“明挖”施工，除了树木，还有可能会对大行宫、浮桥、鸡鸣寺等站点涉及的地下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威胁，“比如大行宫站的现址，是确定无疑的六朝建康城的宫殿及御道区，同时这一站点地上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统府以及省市级文物中央美术陈列馆、中央饭店等”。他建议先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中发现的重要遗迹遗址应当原址保护，并作为公共空间纳入城市空间体系。

道路、高楼、地铁……一轮轮城市改造势不可挡。作为南京古城记忆和象征之一，梧桐树在步步退让中成为珍藏品。不是南京人也许很难体会这种为梧桐宁舍地铁的感情，但他们坚持：“没有地铁或地铁绕道，南京还是南京。没有梧桐，南京不是南京。”

49 棵树的生死

大行宫站前移走的那 49 棵梧桐，“新家”在江宁麒麟镇的一个苗圃，看上去这里更贴近自然，没有城市中心的人流、尾气、建筑、管线。不过，“人挪活，树挪死”，汤庚国担忧，“就像一个北方小院子里待惯的老人，一下子让他搬到香港高楼里，地方再好，老人也不一定适应，何况他已经元气大伤”。

大树移植可以百分百确保存活吗？汤庚国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他当年参与移植 001 号梧桐的故事：就是 1872 年法国传教士种在石鼓路小学的南京第一棵梧桐树，1988 年就第一批纳入古树名木保护，编号 001，可算是受到第一号礼遇。不过，2000 年因为城市开发，也不得不迁移了。那是南京最大的房地产商金鹰集团投资开发楼盘，买下了石鼓路整条街，大树正好“挡”在了楼盘前面。要外国人改大楼方案要花几千万元。当时的《古树名木条例》没那么严格，里

面有一句松动的话：只能就地移。市长就问：能否把树挪 12 米，到路对面？其实不是讨论移不移，而是怎么移。汤庚国正好是当时 4 个参会专家之一，他们当时测得这棵树高 27 米，胸围 3.07 米，直径大约 1.5 米，按照移植土球直径为树干 5～8 倍的规程，土球直径要 7 米，大树加土球重量要几百吨，当时起重机都不可能吊起来。还是中山陵、玄武湖的两个老总工有点经验，他们参与过一个高速路即将穿越的村庄风水树的移植，铁道兵铺设了钢轨，移动一个直径达 5 米的土球，花费 300 万元。他们提出，开一条 12 米长的隧道，在土球外焊钢板，外面再用十几吨槽钢包住，移了十几天，才一点一点移到位。为了移植这棵树，花了 70 万元，还救活了一个濒临倒闭的施工公司。汤庚国说，当时尽量保留了下面的大根，但为了水分养分供给，还是忍痛将上面大枝锯掉了一些，包括四五个鸟窝。尽管如此精心，移植后这棵 130 岁高龄的古树长势就弱了，现在比以前反倒清瘦了一些。

3 号线大行宫前这一批 49 棵梧桐大多植于 1953 年左右，按树龄还远未达到“古树名木”的标准，像这样奢侈的移植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梧桐之所以被称之为“行道树之王”，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耐修剪，耐移植，养护好的话成活率能达到 80%。不过，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蔡剑华告诉本刊记者，当年 2 号线修建的时候，园林局曾经承诺“190 棵迁走的大树确保不死一棵”，但当他 3 月 12 日费尽周折找到了 5 年前 2 号线移植到东郊苗圃中的 83 棵梧桐树时却发现，其中 13 棵以树桩的形式存在，只有 15 棵存活，保存率只有 18%。

树是否存活关键看人怎么对待。蔡剑华说，理想状况是按照南京市编制的《大树移植法》，干径在 20 厘米以上或多年没有移栽的大树，必须先进行裁根促根处理，并经 2～3 年培育，待其长势良好后方可移栽。要保証这些迁移梧桐的成活率，首先在挖树的时候就要肯投入，尽量把坑挖大一点、深一点，多留侧根。移走后苗圃的地点选择也很重要，这些被移植的大树，就像受过重伤的人，既不能泡在水里，也不能晾在山上。梧桐耐土埋，移植的坑深一点，有利于其长侧根。在梧桐树进坑之后，周围要多培土。这些大树主干粗大，水分蒸发量也很大，同时由于迁移中主根侧根被大量切除，一段时间内大树无法通过根系获得水分，因此要对大树的树干进行包裹。“是否能存活，关键要看能不能挺过这个夏天，因为南京夏天热，水分蒸发快。即使过了这个夏天，到了明年春天发芽了也不能完全确认过了危险期，要过上好几

年，年年发芽长新枝才算重新活过来。”

那 49 棵梧桐是不可能再移回原地了。汤庚国说，它们移走时已经被裁根剪枝，元气大伤，好不容易在新住处喘口气，不可能再折腾一遍了。而且地铁建好后周边管线复杂，不适合再栽种大树，就像有人感叹的，“移走的都是‘博士生’，种的都是‘幼儿园’小朋友”。

“当年 2 号线一再更改方案也说明，我们是完全可以保护更多大树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没有把大树看得那么重，只觉得大树要为城市建设让路。”汤庚国说。在香港湾仔的黄金地段有一棵古榕树，因它是香港百年沧桑的活见証，香港人不忍看着它被砍伐，或者被移走，便跟要占用这片山坡的太古集团谈条件：可以在这儿建大楼盖商厦，但一不准砍树，二不准挪树，必须把它原地精心养起来，成为香港闹市一景。开发商接受了，就地造了一个直径 18 米、深 10 米的大花盆，先固定好这棵老树，再在大花盆底下盖楼，光这一手就花了 2389 万港元，堪称世界最贵的榕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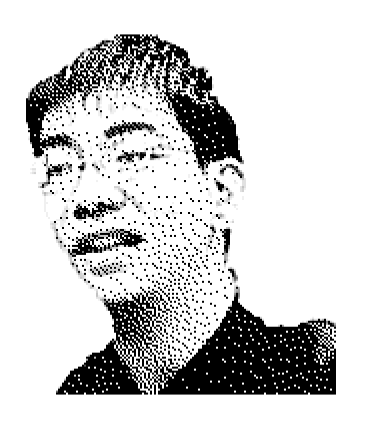
虽然不及古树保护的百年标准，但南京梧桐和它们所在的林荫大道，已经成为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姚远建议，将民国时期的林荫大道纳入“历史街巷”或者文化景观类不可移动文物，整体保护。南京人还记得当年因 2 号线地铁修建要移走金陵饭店前那棵梧桐，饭店员工自发为它送行、认领，因为它比饭店年岁还老、还高，已定格成金陵饭店历史的一部分，“站在梧桐树下看金陵饭店，看得帽子要掉了”。

（贾冬婷：《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原文链接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10325/4294764.html）

【返回目录】

【情】

9-4 纪彭：草根行者梁从诚



“梁从诚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的内心一直有深深的挫败感。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诚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一天，一位衣着简朴的老人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来到全国政协礼堂，门卫拦住了他：“你给谁报到？”“给我自己。”那个门卫不信，直到看他掏出委员证，才放他进门。这位老人就是全国政协常委、大陆民间环保领袖——梁从诚。他的先辈名震华夏，他是“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音之子”，不过这样的称呼是梁从诚生前最讨厌的。梁从诚从 60 岁开始投身环保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从父亲、祖父身上继承的除了聪颖、善良，还有倔强、率直。

在川西一个小县，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大声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1999 年，在上海的全球 500 强财富论坛上，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67 岁高龄的梁从诚登上了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可可西里，亲手焚毁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近 400 张藏羚羊皮，抱着饥寒困苦的保护队员们一起痛哭，转头就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请求他制止英国的藏羚羊非法贸易市场，以推进对藏羚羊的保护。

为了环保，年过古稀的梁先生还坚持骑车出行，2006 年，他遭遇车祸，此后健康每况愈下，不能再骑车，连走路也困难，后来甚至头脑糊涂，连朋友都不认得了。2010 年 10 月 28 日，患病多年的梁从诫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许是宿命，梁家三代所选择的都是曲折的道路，所看到的都是无尽的遗憾。祖父梁启超为挽救民族危亡，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推翻袁世凯帝制，而他所主张的改良主义的结局自不堪回首；父亲梁思成与母亲林徽因，这两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传统建筑的知识分子，为了保留北京古城墙而四处奔走呼喊，乃至痛哭流涕；与先辈相比，梁从诫做的事情也决定了他要面对加倍的漫长、艰难和孤独。

未能继承父业，人生蹉跎五十年

1993 年以前，梁从诫的人生是另一个样子。梁从诫 1932 年出生于北平。梁思成与林徽因十分欣赏北宋建筑家、《营造法式》的编撰者李诫，于是给儿子起名“从诫”，希望他能成为像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幼年的梁从诫跟随父母颠沛流离，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幸运的是，父母有举世无双的杰出才华。在四川李庄那个一贫如洗的家里，母亲林徽因会给他讲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父亲梁思成教他画画，做各种玩具，梁从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浸淫中成长。

1950 年，从小就对绘画有极大兴趣的梁从诫投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两分之差，未能如愿考入，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梁从诫回忆说：“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在北大，梁从诫一直念到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学当了 4 年的历史教师。1962 年，刚满 30 岁的梁从诫被调回北京，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

在“文革”中，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成了革命的对象。他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

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之后，1969 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去，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9 年。

在江西的岁月里，梁从诫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天赋，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1978 年，40 多岁的梁从诫虽被允许返回北京，但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无人问津。直到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把他从外交部调到大百科出版社，梁从诫的人生才开始有了变化，那时梁先生已经年近 50 了。

人们尊他为“专家”、“学者”，梁从诫始终不愿接受。他曾说：“我很清楚，这些称号我都没有资格接受。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做了几年研究生，正值‘反右’、‘大跃进’，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梁先生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只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梁先生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1979 年开始，梁先生创办《百科知识》杂志，担任主编。那时候，许多西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都是通过《百科知识》杂志传播的，透过对西方一些新思潮的引进，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玲珑塔聚会”：自然之友的诞生

“我之前也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小时候也抓过蛇、打过麻雀和鹿子，还吃过它们的肉。”历史专业出身的梁从诫，年近花甲之后的签名是民间环保拓荒者。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从此进入了环境急速恶化的时代。1992 年开始，许多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就常常带来有关环境污染和滥砍滥伐的消息。梁先生了解到由于乡镇企




业遍地开花、污染扩散，到处都是小五金、小皮革制造厂，这些小厂最容易起家，但污染也最严重。于是，成立一个环保组织的想法就在梁先生的脑子里酝酿起来。同时，相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发展状况，90 年代初的公共生活沉寂了，梁先生很希望通过一个合适的领域，重新开启民间社会。他觉得“环保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在梁先生心中，自然之友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很合适。

梁晓燕回忆，1992 年底，梁先生告诉她要成立一个组织，集合大家做环境保护的工作。有一次梁先生对她说：“我已经 60 多岁了，没什么年轻的朋友，晓燕，你去找一些年轻的朋友。”她就联系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和作家兼探险家的王力雄，梁先生、杨东平、王力雄和她 4 个就成了自然之友最早的发起人。

在那个很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NGO”的时代，梁从诫根据国家条例，开始为注册而奔波。他向亲戚借了 300 元注册费，骑上自行车，找了一家又一家部门，一次又一次的被拒。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由他担任导师的“中国文化书院”名下终于多了个“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创办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梁从诫就将办公室设在自己干面胡同的家中，对外公布家庭地址和电话，全部员工只有他和夫人方晶两人，他们手写座谈邀请函，一张张粘贴邮票。梁从诫在自然之友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都是靠老伴一人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他去华盛顿开会，甚至舍不得吃上一份附带培根的早餐。

自然之友要成为一个组织还要看有没有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就打算在这一年，即 1993 年的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这天组织一次会议。那时候，要找一个合适的会议场所并不容易，王力雄是个探险家，对自然有强烈的情感，他提出，“干吗非要在屋子里开会啊？咱们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可以不拘小节。”此言一出，大家都很赞同，原本选定了两个地点，一个是紫竹园公园，另一个就是京西八里庄的玲珑塔。

1993 年的时候，玲珑塔附近还是一片荒地，古塔也已经很破败了。这样一个环保聚会都叫了什么人呢？梁先生对梁晓燕他们 3 个说：“你们觉得朋友中哪个人会对环保有兴趣，就叫他来，告诉他可以再带朋友。”就这样，按照类似传销的模式，总共有 82 人来到玲珑塔下，参



与了自然之友的第一次活动。

这个后来被称为“玲珑塔聚会”的活动，标志着自然之友的正式成立。自然之友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活动了，1993 年 9 月，组织了第一次环境教师培训，地点也是在户外——十三陵的德陵边上的荒地里开始了培训会。1994 年之后，自然之友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自然之友像一只母鸡一样，孵化出了无数民间环保小鸡。

当初，父亲梁思成在中国第一轮工业化大潮面前“不合时宜”地提出保护北京的城墙和古建筑；现在，儿子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的狂飙突进中再次担当起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的角色。

为环保敢说敢干，却时常感到无奈

2001 年 3 月的一天，自然之友、绿家园、地球村等 3 家环保 NGO（非政府组织），与北京市的政府官员举办了一个“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会中，某负责人姗姗来迟不说，还对会场横幅上的“对话会”极为不悦：“要早知道是‘对话会’，我就不来了！”

“对话会”开始后，这位负责人滔滔不绝，大谈北京市的水利工作如何有成就。坐在台下的梁先生拿起话筒，打断话头，力陈目前的生态困境，批评环境治理不力。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梁从诚斥责他：“你们在给自己找理由！”、“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位负责人绷不住了，站起身来，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责令“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谁报道追究谁的责任”，然后扬长而去。多年以后，与会的一位环保人士还对梁先生的话印象颇深：“特别直接，毫不留情。”

在三峡考察时，梁先生看到长江边上，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汤沿着江水往下流，足足有半

里路宽。他不仅亮出了自己“名门之后”的牌子，还亮出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质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他们污染的？”县长说是一个造纸厂的问题。“为什么不装处理污水的装置？”梁先生接着发问。县长说这个造纸厂是 1958 年“大跃进”时靠两口大锅起家的，当时叫“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现在要装一台废水处理装置，投资要超过那个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再说三峡水库修好后，这个厂子在淹没线以下，就几年了，污水处理装置就是装好了，又要被水淹了。“那为什么不停产，你看看把长江污染成这个样子。”梁先生不依不挠。厂长说 2000 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 6000 人，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这 6000 人谁给我养活啊？梁先生无语了。

在地方政府“发展”逻辑下，梁从诚先生的努力常常是无力的。1995 年，梁从诚了解到云南德钦县为了经济利益大量砍伐原始森林，破坏了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栖息地，为了制止当地政府对原始森林的破坏。他通过媒体朋友报道这件事实，又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书中央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作了批示，给予德钦县财政补贴，初步制止了那里的大肆砍伐。可事与愿违，梁先生的努力虽然制止了德钦县的砍伐，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财政补贴反而助长了云南原始森林的破坏。临近的县看到德钦县因砍伐原始森林而得到了大笔财政补贴，就纷纷效仿起来。梁先生气愤之极，再次联络媒体对此事进行公开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补贴到手，斧锯出手”为题，将此事真相再次向社会公开报道。可在现实的逻辑下，这种报道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单纯以 GDP 衡量经济发展和升官的时代，梁先生的努力带着极大的无助和无奈。

几年前，梁从诚到宁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菜，晒干后卖几分几毛钱，这便是维持一家人生计的来源。挖发菜会造成水土破坏，但梁从诚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每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是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呢？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太无力了。对那些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人们谈环保，我有一种负罪感。”梁从诚说。他深深地意识到，人口问题是当下最大的环境灾难，他对几十年前马寅初提出的人口论再一次给以肯定。

身体力行，感召世人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自然之友将环境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如果在一个社会组织比较强大的国家，搞环保教育自然是要借助政府资源、利用学校平台。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不具备这样的开放程度。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公信力还未树立的时候，讲环保的大道理是不行的，只能身体力行。

自然之友成立之初，梁先生经常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去北京郊区植树，去风景名胜区捡拾垃圾。这些均是普通人的绿色志愿者们，默默做着自己想到、看到的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琐事，用梁先生话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其中梁先生的以身作则，感召了一大批同志。

梁先生用自己的生活来诠释环境保护，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他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梁先生家收到的信件，从来都是把信封拆开，反过来用胶水粘好，自制信封再用一次，梁家人并不把这个当什么事情，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司空见惯。他经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和陌生的来访者交流关于环境、社会的看法。这些来访者里，有拿着网兜的家庭主妇、有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戴着眼镜的退休教师，当然，也有卷着裤腿的农民。

梁晓燕告诉我，梁先生去世之后，因帮助料理后事，她才了解到，梁先生还没忘记当年在“五七干校”的手艺，70 多岁了还亲手做一些利于节水和储存废物的家具。

在梁先生的感召下，自然之友也非常自觉的当起了环保试验田。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

好带来的。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刷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梁先生的夫人方晶对他的一次领奖记忆犹新。2000 年，梁从诫获得菲律宾颁发的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麦格赛公共服务奖，以表彰他为公共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领奖前，方晶带梁从诫去买了新衣服，但梁从诫却不肯再买一双新鞋，最后还是穿着 20 年前的一双旧皮鞋去了领奖现场。

自然之友会员郝冰说，今年春天曾接到方晶的电话，她想为因病不能自理的梁从诫在福利院安排个床位，却因人太多无法实现，托郝冰找朋友想想办法。郝冰后来才从朋友处得知，梁从诫居然没有医疗保险。

并不是悲剧，更绝非失败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这扇门，使更多的亮光投进房间。100 多年前，梁启超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奔波操劳，50 多年前，梁思成以一己之力保护古都的建筑精华，大器晚成的梁从诫先生，花甲之年投身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硬是凭借着他的赤诚，改变了国人的观念。

1994 年自然之友刚刚成立之初，环境保护和 NGO 还是陌生的词汇，16 年之后，当梁从诫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环保和 NGO 这两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初仅是一小群人的行动，如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梁从诫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的内心一直有深深的挫败感。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一次专访中，梁从诫认真地

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这是怎样的回报呀！整个 20 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挽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挽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挽救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使命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种悲壮与执着，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证解。论功业，梁家也许是失败者，若论精神与操守，论对于中国的贡献，他们永远活在国人心中，铭刻在史册上，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纪彭：《文史参考》编辑。

原文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21729990.html）

【返回目录】

9-5 耿栋：年保玉则的观鸟喇嘛



“他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他的动力源自对自然的热爱，并且付诸行动，让藏鸦这个珍稀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填补了当前科学研究的空白。他让我们看到了民间保护的巨大力量。”

“我叫扎西桑俄，‘扎西’在藏语里是‘吉祥’，‘扎西桑俄’就是‘好吉祥啊’。我出生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我家在年保玉则山下面有一个牧场，牧场旁边是一个湖，湖的形状很像一只蝴蝶。我住的帐篷就在这个蝴蝶翅膀的一角上……”

那是在 2008 年 5 月的西宁，青海省林业厅国际合作处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青海果洛、玉树、海西、海北等州县的十几位乡村保护带头人正在进行一次生物多样性保护培训。身穿绛红色喇嘛服的居•扎西桑俄本来就很显眼，而这么有趣的自我介绍，一下子强烈地吸引了我。

我喜欢鸟，近年来一直徜徉在中国西部观鸟、拍鸟。这次与会，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一个 NGO 环保组织的媒体顾问。我的任务是发现有意思的保护带头人，并发掘他们的保护故事。

很快，我就把目标“锁定”到了扎西桑俄身上。实际上，比完成“任务”还让人欣喜的是，扎西的兴趣竟然和我惊人地一致。而且，他还多一项——喜欢画鸟。随后几天，在青海湖环湖考察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拍摄，一起辨识和讨论所见到的每一只鸟。

按照和扎西的约定，4 个月后，我和同事吕宾从成都出发，开车走了两天高原山路，直奔扎西的家乡——年保玉则山下蝴蝶状湖泊边上的那个牧场。

这个湖泊在众多旅行手册里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妖女湖。但是，很显然，站在湖边迎接我们的扎西并不认可它：“这个湖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这几年旅游局把很多湖泊的名字都改

了。以前，我们叫她俄措尕玛。她是圣湖，湖里有很多水鸟，赤麻鸭、黑颈鹤，还有各种鸥。小时候，我瞒着大人偷偷去湖里玩，大人知道了会很不高兴。因为湖水很神圣，用手碰湖水都是不对的。”

这次，我和吕宾事先准备了详细的文案，计划以年保玉则区域为背景，拍摄一个关于扎西桑俄的短小纪录片：《鸟语者》。就这样，扎西面对我们的镜头，开始了娓娓的讲述

扎西说：“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

13 岁时，扎西离开了鄂木措尕玛边上的家园，被送进了 40 公里外的白玉寺。久治的白玉寺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大寺的子寺，坐落在狭长的谷地达尔塘中，清冽的俄科河在寺前逶迤流转。因为离开了家，离开了湖，离开了那些鸟，扎西并不开心。他说：“我晚上经常梦到它们。”

藏族人的学业很多都是在寺院成就的。扎西也不例外。教导扎西的上师喜欢历史，但他不喜欢学历史，所以扎西觉得自己“学得不太好”——当然，这只是他自谦的说法。14 年后，扎西便考取了格西学位，成了“深通佛学经典”的堪布。

14 年的求学期间，扎西桑俄对鸟的兴趣有增无减。他还记得第一次远离家乡到查理寺时的“新发现”。白玉寺海拔大约 3600 米，属于牧区；查理寺的海拔低了 500 米，有了森林。“这里的鸟跟家乡的鸟完全不一样。”扎西说，“以前，我还以为白玉寺的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鸟。直到 19 岁到了查理寺才知道，原来鸟类会有这么多！各个地方会有这么不同！我开始想要看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鸟。”

渐渐地，扎西爱鸟的名声流传开来，当地长者说他可能是“麻雀转世的”，大家送给了他一个绰号：“观鸟喇嘛”。在白玉寺周围差不多 50 公里范围内，人们看到了受伤的鸟儿，会

想到送给扎西救治。有的朋友想见他了，就带话来：“发现了好看的鸟儿。”等扎西兴冲冲地奔去，朋友又会逗他：“刚刚飞走了。”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收集”鸟的故事，所以，总有人主动来找他，想讲故事给他听，还要他请客。为此，扎西不得不制定了一个专门的标准：“从来没听过的好故事，我就请吃饭；一般故事，请喝饮料；听过的故事，我就说，不能请了，不能请了”

扎西第一次遇到画画的人，是在 1985 年。那年白玉寺重建，从阿坝请来了两个画家。画家需要人打下手，寺里便派了 20 多个小喇嘛，15 岁的扎西就在其中。画家可能觉得他太小了，让他从磨石头、做颜料开始。于是，差不多整整一个月里，扎西早晚跟着上师读书，白天就去帮画家磨石头。

一天，两个画家终于大功告成了，送给扎西等小帮手每人一根毛笔作为答谢。扎西拿到毛笔依然不肯走。画家问：“你还想要点什么？”

扎西只是在心里回答：“想要画画。”

扎西很感激阿坝的画家。他们不仅仅赠送了毛笔，还教会了扎西做颜料。白玉寺里面有一个老僧人会做纸，他又教会了扎西做纸。渐渐地万事俱备，到 17 岁，扎西终于开始在纸上画鸟了。他记得自己画的第一只鸟是俄措尕玛湖里的赤麻鸭(黄鸭)，不过那时候画得不是很像。

扎西说：“我觉得，要做事情，‘喜欢’是最重要的。基本上藏区我观察过的 393 种鸟，我全部画过 4 次。17 岁时画过第一次，但那时画得太夸张了，黄色的地方很黄，红的地方就特别红，就像动画片一样。第二次在四川那边画的，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第三次画鸟是 2001 年在西藏林芝。那时扎西已经拥有一个小小的磁带录音机，遇到鸟儿就赶紧录下来自己观察到的特点：嘴巴是什么颜色，翅膀什么颜色，肚子什么颜色，飞起来是什么样子晚上回到驻地一边听录音一边画，第二天再拿着自己的画去跟鸟实际对比，把需要修改的细节再录下来，回去再改。

喜欢旅行的扎西，每年去拉萨都会住同一个旅馆：吉日旅馆。2003 年夏天，他在吉日旅馆

看到一个女孩正在看一本很美、很美的关于鸟类的书。扎西开始想办法接近她。

她就是深圳观鸟协会的董江天，她在网络上有一个更有号召力的名字：麦茬。

这次邂逅对于扎西而言，意义重大。他给麦茬展示了自己厚厚的观鸟笔记和自己的绘画。这个热心的女孩受到了感染，并立刻意识到，扎西需要帮助——他绘制的鸟儿，画风很纯朴，用色很大胆，但是比例有问题。

回到深圳之后，麦茬立刻给扎西邮寄了一大批关于鸟类、观鸟等专业知识的图书、BBC 生态影片，还寄来了单、双筒望远镜。

2005 年夏天，麦茬赶到了白玉寺，陪着扎西观鸟。扎西也因此知道了自己熟悉的鸟儿们在书上的名字。“他的高兴完全溢于言表，他发现自己不孤单，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都喜欢鸟！”麦茬回忆说。

在麦茬等“鸟友”的帮助下，扎西的观鸟装备越来越齐全了。到 2006 年，扎西甚至在姐姐的资助下，得到了一台准专业的照相机。对照观鸟时所拍摄的照片，他又发现自己以前画的鸟“神态不像”了。

于是，他第四次给藏区的鸟儿一一画像。“我曾经在雪地里用脚画过一只像这个院子这么大的鸟，我就知道了画画是靠心的。”扎西总结道。因为从来没有师傅教过扎西画画，扎西觉得自己的画不是国画，不是水彩，也不是唐卡，他还打了个比喻：“只是‘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一点。”

高僧说：这座神山跟我一起变老了

2005 年夏天，麦茬和扎西在白玉寺周围观鸟。一个傍晚，一种麻雀大小、貌不惊人的小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扎西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异样，而麦茬看到它鲜红栗色的背部和红褐色的眼

珠时忽然激动起来。

那是一只藏鹀！藏鹀(Emberiza koslowi)在藏语里叫 SIXU，直译过来就是天珠鸟、天珠雀。大概它头部羽毛的纹理很像藏族人青睐的天珠。这种雀形目鹀科鹀属的鸟儿属于中国特有，而且分布区域极其狭窄，以至于可以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查到它的名字。在这之前，在整个中国观鸟界，关于藏鹀的记录寥寥无几。而这一天，他们不仅仅看到了两只藏鹀成鸟，还发现了一只幼鸟。

麦茬深谙藏鹀的价值。回到深圳之后，她帮助扎西向香港观鸟会申请了一笔小额基金，用于藏鹀的调查和保护。这次跨年度的摸底调查为 2007 年向世界自然基金会濒危动物小额基金申请项目奠定了基础。

扎西认真地进行了保护试验。他发动白玉寺的僧众，尝试了多种保护办法。譬如，猪獾是藏鹀的天敌，经常偷吃鸟蛋。他们就在藏鹀的巢穴周围放几件人穿过的衣服，猪獾怕人，可以吓跑它。但是，过几天衣服上人的味道散掉，猪獾就不怕了。几番尝试之后，他们开始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蹲点驻守。在藏鹀的窝附近搭个帐篷，15 个人轮番值守了 46 天。最终，在他们蹲点儿那儿总算保住了一窝，并成功繁育出 5 只幼鸟。40 多天后，小藏鹀长成，在 9 月份飞走了。

通过调查，扎西手绘了一幅比《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里的相关图目准确、详尽得多的藏鹀分布图。他发现，藏鹀的稀有与它们的习性息息相关：这种小鸟筑巢于地，以至于繁殖期间危机四伏。

2008 年，扎西又得到了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欧盟的一笔小额保护经费。有了经费之后，他将调查出来的藏鹀分布集中区域——阿木龙沟 5 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藏鹀保护区，并向山谷里的牧民支付一定的补偿，说服他们在藏鹀的繁殖季节让出草场。最后，达成协议的 3 户牧民带着 100 多头牛羊，在藏鹀的繁殖期实行放牧避让，为藏鹀哺育后代留出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扎西还在这个保护区立起来一个很大的宣传牌。“牌子立起来了，好多当地人说，哦，原来藏鹀就是这个小鸟儿啊。好好好，我们知道了，以后可以一起来保护。”扎西感到了宣传的力量。

因为与许多 NGO 组织的接触，扎西桑俄的视野更加开阔了。这些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人口压力的增加、旅游资源的开发，对家乡的草场退化、生态变迁，扎西再也不能视而不见。而且，他意识到，爱鸟、护鸟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于是，2007 年，扎西创办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协会刚成立的时候，白玉乡有一个 98 岁的高僧，托人送了一张照片过来，照片上写着他的名字。高僧还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出生在年保玉则山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山是什么样子。白雪、冰川、湖泊、各种花草、各种动物真的很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可是这座神山跟我一样变老了，现在的模样让我很难过。我这一辈子快要结束了，我下辈子还是会做人，我先来给下辈子报名。”

扎西立刻回信给他，许下了承诺：“协会会长的职位留给你，你以后(下辈子)一定要来。”现在，扎西的协会已经有 15 个工作人员，大多身份和他一样，就是白玉寺的喇嘛；还有 63 个协会会员为牧民和农民。这个原住民组成的协会除了保护藏鹀，还开始监测年保玉则的雪山、湖泊变化。

而我那次因为拍摄《鸟语者》，与扎西相处半月之久，最难忘的还是扎西趴在地上，对着一窝小藏鹀倾诉衷肠的场景。扎西的语调，就像面对自己的老友：“藏鹀啊，我跟你说句话。你以后做窝的时候不能做在地下，应该做在有刺的树干上。要不然的话，猪獾啊，黄鼠狼啊，都要吃你的蛋，所以你就只能那么少，我们都没有办法保护你！你听明白了没有！”

佛说：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2009 年 7 月，扎西桑俄带着藏鹀的科学论文集来到北京，参加了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并应邀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吕植教授主持的“中国的保护实践”专题报告会上，向与会的中外学者讲述自己观察、研究、保护藏鹀的经历和经验。

吕教授是这样介绍他的：“他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他的动力源自对自然的热爱，并且付诸行动，让藏鹀这个珍稀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填补了当前科学研究的空白他让我们看到了民间保护的巨大力量。”

然后，身穿绛红色僧服的扎西桑俄站到了讲台上。他羞涩的笑容、蹩脚的汉语、诚挚的语调和扎实的内容，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会后不久，许多中外媒体都报道了这位“观鸟喇嘛”的故事。

而我陪着扎西去了一趟北京植物园。看到许多树干上缠着的塑料胶带，扎西很奇怪。我告诉他这是为了防止蝉等昆虫幼虫爬到树上危害树木。扎西又看到了诱虫灯，接着奇怪。我解释了其防止害虫的功能。扎西越听越迷惑。

8 月，在青海湖“乡村之眼——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牧民影像培训会上，我再次见到了扎西桑俄。“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源于藏语“松芭喇纳唐吉嘎”，含义是“所有生命都希望鲜活地活着”。就此主题发表意见时，扎西谈到了北京植物园。“那里的植物不是真的植物，而是塑料。人和虫子的区别有很多，但对于大自然来说，生命都是一样的。”简而言之，他就是反对以人的利益为基准，来区分益虫、害虫，来决定哪些生物应该受保护。

其实，扎西桑俄的故事让我深深着迷的，正是他的所作所为背后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我还记得在扎西家里，发现他家的墙壁上有红嘴山鸦的出入通道。扎西告诉我，那是建房子的时候父亲专门留出来的。从小他就听着这样的民谚长大：“人悲伤的话是一年的事，鸟类

痛苦的话一生都会痛苦。”对于普通的红嘴山鸦，果洛藏族也有说法：“伤害一只红嘴山鸦，就会死一头牦牛。”

扎西在白玉寺的上师，也灌输给他类似的思想。如果剩了热水不想喝，他从来不直接往草地上倒，而是高高地往天上抛出去。他教导扎西：“这样，等水再落地就凉了，不会烫到虫子。”扎西从白玉寺“毕业”的时候，上师还叮嘱过他：“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了。不过我对你还有两个要求，一个是永远不能做坏事，还有一个是不能欺负动物。你再怎么欺负人，也只能欺负一点点。可是动物跟人差得很远，你欺负动物它是没有办法的。”

参加这次“乡村之眼”培训的牧民多有自发的保护行为。来自刚察县三角城种羊场辖区那仁社区的学员加悟才让，简直就是另一个扎西桑俄。他自幼就喜爱格萨尔王的马倌——神鸟黑颈鹤。从 2005 年开始，他认真记录每年迁徙到那仁湿地里的黑颈鹤数量，并一直坚持至今。

在西藏森格南宗神山脚下的贡觉县东巴村，还有一位叫做仁青桑珠的藏族人，好多年前就开始带领村民种树，绿化、保护他们的神山在青藏高原上，确实不乏类似的人物和故事。

在国外，宗教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也不乏实例。写此文时，我刚读到一则关于印度古村落布什诺的故事。这个村落形成于 15 世纪。一场严重的干旱后，村民杰布瑟瓦尔得到启示：这是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规律造成的。于是他设立了 29 条黄金信条：不许砍树、不许杀害动物其追随者被称为“布什诺”。1730 年，一支皇室驼队浩荡而至。原来皇宫正在修葺，布什诺村庄周围粗壮的耶里树正是他们垂涎的原料。没想到，这时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3 个孩子的母亲阿莫德芙，竟死死抱住树干，高喊着“一颗砍下的脑袋不及一棵砍断的树值钱”，誓死捍树。后来，又有 362 个村民效仿她，在同一天被砍掉了头颅。皇室王公终于被感动，下令停止屠杀，并以布什诺人的村庄为核心，建立起保护区。

在“乡村之眼”培训会上，扎西桑俄提出，在藏区应有三种主要的保护方式：一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如藏传佛教中“众生平等”、“神山圣湖”的观念；二是尊重信仰；第三，才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并设立保护法律、法规。我记得世界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深入藏区调查后曾说过：“地球上每一寸土地都需要保护，(我希望)每一寸土地



都是‘神山圣湖’。”我想，他那么说是因为，藏文化深处的某种观念正好切合了当今世界环保 NGO 一致的理想和追求：让我们更加敬畏自然。

（耿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宣传官员，野生动物纪录片导演、自然摄影师、自然地理撰稿人。

原文链接 http://cng.dili360.com/cng/jcjx/2010/04152408.shtml）

【返回目录】



【省】

9-6 曲格平：文明的衰败与启迪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古代印加、古代中国等光辉灿烂的文明，但都出现了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生态破坏带来的文明衰败的现象，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和启迪。保护自然，修复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应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果若如此，新世纪的人们将会迎来新的希望，人类文明将会走向光辉的彼岸。”

前些天，我去了内蒙，强劲的西北气流卷起了漫天沙尘，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有沙吞山河之势。我走进一片由小叶杨组成的林网农田，顿时，大风失去了它的桀骜不驯，只在树梢间呼啸，在农田里，却风缓土静。我第一次看到了林木神奇般的威力，使我领悟到，我国沙化土地之所以无止境的蔓延，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保护大地的绿色植被，特别是砍伐了阻挡风沙的林带。

树木对人类是多么重要！并由此引发了我一些些联想。

人类是从森林里走出来的，是森林给了人类生命最初的质感。同样，人类的智慧也是在树木绿荫的庇护下成熟的，是树木给了人类智慧最初的灵感。没有树木，没有森林，智慧的闸门就会关闭，文明的源泉也会枯竭。早在公元前 525 年，释迩牟尼深居王宫，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天，他无意中走上街头，惊讶地发现，满街都是贫困交加、疾病缠身、痛苦不堪的人群。他十分震惊，痛切地感受到人生无常和苦海无边。于是，他抛妻别子，逃离宫殿，来到菩提迦耶的一棵菩提树下修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苦思冥想，他忽然顿悟，创立了佛教，而佛教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经久不息。如果没有那颗菩提树，释迎牟尼会是怎样呢？

稍后，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山东曲阜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学校。说是学校，其实与今天的学校大不一样，那仅仅是一方杏林。每天，孔子都在这方杏树园里教学讲道，向他的弟子授业解惑。后来，他的弟子将他的言论辑录成册，成了儒家学说的开山之作，并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几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宗。如果今天我们翻开儒家经典著作，似乎仍然可以闻到字里行间飘散着的杏仁的清香。如果没有那片杏树林，中国文化又将走向何方？

几乎与此同时，古希腊的柏拉图也在遥远的雅典创办了自己的学园，作为传播思想的一个基地。在柏拉图学园里，培育了一批西方最早的思想巨匠。特别是，这个学园结出一个最大的硕果，就是他的弟子亚里斯多德，把古希腊哲学推向了一个至今无人企及的顶峰，后世的思想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为他的哲学作点注释。如今，这片学园的当初景象已无从考迹，但从希腊历史记述中可以看到，当时希腊半岛上，到处种植着葡萄、橄榄树和无花果，可以想象，当初学园里也会是林木葱茏、花果飘香，犹如一个大花园。当这些思想巨子们倘佯悠游于丛林之间，驰骋遨游于精神王国之时，西方文化的胚胎实际上已经孕育于他们的心灵之中。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摇篮，就是那一片小树林。

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便是希伯莱文化。希伯莱人创立了犹太教，为西方文化铺垫了又一块基石。据《旧约全书》的说法，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便把他们放在了伊甸园里。那里景色优美，树木茂盛，果实累累，宛如人间仙境，人类的老祖先便在这里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这番景象绝非希伯莱人的杜撰和想象，而极有可能是当时真实生活的写照。希伯莱人的精神领袖摩西曾用这样的话向他的信徒们形容这块福地：“这是一片溪水潺潺的沃土，泉水从谷地与山丘上涌出;到处长满了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与石榴树;到处有橄榄油和蜂蜜。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将面包吃够，什么都将应有尽有。”今天，当我们翻开《旧约全书》时，每一页都充溢着诱人的“牛奶和蜂蜜”的醇香。

无论从古代神话中，还是从历史记载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树木和森林不仅哺育了人类的生命同样，也滋养了人类的精神。然而今天，当我们回眸人类最初的家园时，我们痛切地看到，在故乡古老的土地上，黄色筱盖了绿色，荒漠取代了沃野，河流干枯了，树木凋敝了，土地贫瘠了，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是林木繁茂、水草丰盛的“希望之乡”，而变成了杳无人迹、沉





寂荒凉的“死亡之海”。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实在不是地球的好管家。

创造第一个欧洲字母的人已经故去，弥诺斯迷宫中的神牛亦化为了一杯黄土，但那镌刻在雕像上的信念、那建造在稚典大地上的庙宇以及埋藏着无数珍宝的陵墓，却跨越了时空的星河，向我们尽情展示了古希腊文明的辉煌与璀璨......有人说如果人类若想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不妨去追忆那已经飘然逝去的古文明。是的，面对着迈锡尼城堡的繁华;面时着用黄金铸成的庙宇塑像;面对着用血汗浇灌的和平橄榄枝，我们只有汗颜与敬仰——引自《人类古文明失落之迷全破译》。

我们不妨再看看人类几大古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已是怎样一番景象。

公元前 3000 年，在尼罗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出现了埃及文明，最初的埃及人较早地掌握了农业生产需要的灌溉技术，在尼罗河洪水冲积的肥沃土地上发展灌溉农业，创造了伟大的农业文明，并由此兴盛了将近 100 代人，最后他们屈服于外来的侵略者，而他们的土地作为一个主要的粮仓，依然帮助那些征服者们度过了 2000 多年的富足生活。尼罗河流域的土地所以能使文明繁荣达数千年之久，主要取决于尼罗河河谷地区独特的自然特性。正是由于尼罗河一年一度的周期性泛滥，带来了上游的淤泥和有机质，才使得干旱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原野，并由此支撑起了一个文明古国。

同样，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曾经诞生过繁荣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这块广裹肥美的平原由发源于小亚细亚山地的两大河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而成。公元前 4000 年，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在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发展灌溉农业。幼发拉底河高于底格里斯河，人们很容易用幼发拉底河的水灌溉农田，然后灌溉水排人底格里斯河，再流人海。他们的农业非常成功，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宏伟的城邦。公元前 20 世纪，阿摩利人征服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古巴比伦王国，发展了光辉灿烂的巴比伦文明。约公元前 540 年波斯人人侵，但只维持了两个世纪，公元前 323 年被马其顿征服。巴比伦文明毁灭并被埋藏在沙漠下将近两千年，变成了历史遗迹。古巴比伦文明的败落曾经被看成是一个秘密，但地理学和生态学却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破解：古巴比伦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灌溉。由于古巴比伦人对森林的破坏，加之地中海气候的特点，使河道和灌溉沟渠淤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



重新开挖新的灌溉渠道，如此地恶性循环，使得水越来越难以流人农田。更严重的是，古巴比伦人只知道引水灌溉，不懂得排水洗田。由于缺乏排水，致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给这片沃土罩上了一层又厚又白的“盐”外套，淤泥和土地的盐渍化，终于使古巴比伦葱绿的原野渐渐褪色，高大的神庙和美丽的花园也随着马其顿征服者的重新建都和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而坍塌，如今在伊拉克境内的古巴比伦遗址已是满目荒凉。

在中美洲热带低地森林中发展起来的玛雅文明，也是由于地力的耗竭而走向衰亡。上世纪中叶，探险家们在中美洲热带森林里，发现了用巨大的石块建造的雄伟壮观的神殿庙宇，至此才知道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个伟大的文明。那么，玛雅文明为什么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里就由兴盛走向衰落呢？最新的科学研究揭示，正是由于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土壤侵蚀日渐加速，致使耕地生产能力耗损无遗，才使得辉煌一时的玛雅文明走向毁灭。玛雅文明无疑又是一个环境破坏酿成的悲剧。

八十年前的一个狂风漫卷的傍晚，几位印度勘测员在一个废旧的佛塔中拣到了几枚残破的石制印章。谁承想，印章竟如同一把洞开尘封千年的历史大门的钥匙，把一个三千七百多年前的文明大都市从黄沙下唤醒了一这就是摩亨佐·达罗......奔涌的印度河哺育了一代代勤劳智慧的古印度人民，他们在这个星球上第一个种植了雪白的棉花，建造了第一个拥有水道、浴室及垃圾系统的庞大都市，他们还把十进制的文明成果福泽于千秋万代人类......当佛教信徒们虔诚地跪拜在释迎牟尼像前时;当人们沉醉于超然物外的瑜伽境界时;当孔雀帝国的文明魅力光耀千秋时，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思絮放飞到了印度河畔，把目光凝眸在了两河流域的七彩往昔......

引自《人类古文明失落之迷全破译》。

印度文明被称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其文明的发端与所依赖的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坡度徐缓的高原，境内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在北面，喜马拉雅山脉如屏障耸立，南面则以低矮的文迪亚山与德干高原相隔。印度的平原地区面积远远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面积的总和。在这广阔的平畴沃野上，流淌着印度河和恒河。印度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明—哈拉巴文明，就是在北印度平原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上产生的。

广阔的北印度平原被拉其普拿沙漠和阿拉瓦利山脉分为两个部分。沙漠以西的平原为印度河所灌溉，以东的平原为恒河及其支流所灌溉。河流将高原上的土壤带到平原上堆积起来，使土壤肥沃，河流则使交通十分便利。印度河一一恒河流域丰饶的平原地区，被人们称做是大自然对印度民族的慷慨赐予，它哺育滋养了悠远的印度文明。然而，近代以来，森林的急剧破坏导致这个处于热带地区的文明古国的生态系统变得极其脆弱。不仅许多昔日的沃野良田变成了沙漠，而且水旱灾害连年不断，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不合理的灌溉又加速了土地的盐渍化。直到 60 年代，在联合国专家的帮助下，通过抽取地下水给土壤排盐，并在印度河上游建立曼格拉大坝调节灌溉渠道中的水量，才遏制住土地退化的势头。

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地中海国家，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它们之间隔着辽阔的欧亚内陆地区，也就是现在中国西北部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炎炎烈日，天色苍苍。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事物，偶尔看见一只骆驼孤独的身影，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在空旷的沙漠上回荡着渐渐消失，已经不见绿洲，昔日的生机已经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回忆，来往穿梭的商旅的身影也只能在人们的想象里复活了。这里曾经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宝地，如今只有一片无言的土地，轻轻诉说。

引自《人类古文明失落之迷全破译》。

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先秦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乃是气候温和，植被茂密，整个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超过 50%。先民在此逐水而居，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开始大兴土木，毁伐森林。为修建阿房宫，砍光了整个蜀地岭上的树木。故有“蜀山兀，阿房出”之说。到了汉朝，人口剧增，粮食需求急剧增长，毁林开垦就成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于是，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大垦殖，耕地面积由秦时的 1 亿亩左右，上升到西汉时期的 8 亿多亩，土地的增加多为毁林开垦所造。现在的乌兰布和沙漠在西汉之前还是植被很好的地区，经过历代砍伐开荒，到了北宋，这里已是“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真驼”的地区了。东汉至隋朝年间，由于战乱，人口锐减，环境压力相对减轻，生态环境有了一定的恢复。后至唐朝，经济繁荣趋于鼎盛，人口急剧增长，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更大规模

的毁林开垦，仅新垦地就达 6 亿多亩。史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未耜亦满”。这种对“高山绝壑”的开垦，不能不破坏高原植被，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满目疮演，导致黄河频繁泛滥。天灾加上人祸，使黄河流域经济渐趋衰落，等到安史之乱之后，昔日繁华的黄河流域，竟到了“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的地步。田地荒芜，水利失修，人口大量死亡和南移，使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开始衰落，我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渐渐移至长江流域。

纵观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玛雅文明等古老文明，它们都在兴盛繁荣和辉煌了十多个世纪之后毁灭了，或者埋藏在沙漠下，或者遗留在荒野中，成为历史陈迹，只有在考古发掘中证明它的存在。文明人主宰环境的优势仅仅只持续几代人。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迅速地走向衰落和覆灭，其平均生存周期为 40-60 代人(1000-1500 年)。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越是灿烂，它持续存在的时间就越短。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毁坏了支撑文明生长的环境。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文明人跨越地的表面，在他们足迹所及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这正是文明由盛人衰的根源所在。今天，当人们凝望一个又一个古文明的废墟时，不能不感叹人类的骄妄、贪婪和无知。一部文明的兴衰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盘剥自然并最终自食恶果的辛酸史。

我们在回眸人类足迹时，从文明的兴衰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和启迪呢？

启迪之一：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态度将是人类文明持续的基础。人类必须意识到，自然环境不是我们欲望的函数，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体。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有一条永远割不断的脐带，当我们从自然母体中汲取营养而创造文明时，我们不要忘记自然母亲的恩德，更不能做一个以怨报德的不孝子孙。人不过是自然之子，我们无时无刻不受自然的恩惠，我们的生存无不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资源，如土壤、空气、水、气候、森林、草原和各类动植物，对人类来说都是生死枚关。人类文明与大自然的命运已紧密交织在一起，就如同心灵和躯体一样密不可分。今天，人类不能再以一个征服者的面目对自然发号施令，而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觉充当维护自然稳定与和谐的调节者。从一个号

令自然的主人，到一个善待自然的朋友，这是一次人类意识的深刻觉醒，也是一次人类角色的深刻转换。实现这一角色的转换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强制，更需要人类的良知和内在的道德力量。人类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以便为人类适应这种新的角色建立起新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启迪之二：倡导一种拜自然为师、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许多古文明之所以从强盛走向衰落，是因为他们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很少或根本没有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对自然界肆意开发和掠夺，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最终酿成文明的衰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如此，玛雅文明如此，哈巴拉文明也如此。直至今天，我们仍未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甚至采用更加强大的手段破坏着更大范围的生态系统。如果说，过去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破坏的只是局部的生态系统，最终导致一个区域性的文明衰败;那么现在的工业文明破坏的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等等。可以设想，一个失衡的地球怎么能够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文明大厦呢？因此，人类必须从现在起，拜自然为师，循自然之道，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办事，从自然界中学习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我们不要过度迷恋人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信条，

实际上，现存的环境问题往往是我们对自然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结果，它的最终解决需要我们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发现和掌握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

启迪之三：倡导一种保护自然、拯救自然的实践态度将是人类文明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几千年来，文明人足迹所过之处常常留下一片沙漠，这是文明的悲剧。人类在不断吞噬自然的躯体，同时也在品尝自己所酿造的苦酒。今天，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能领略到气候变化的威胁。有数据显示，全球气温自 1800 年以来一直缓慢上升，20 世纪是过去 600 年间最热的一个世纪。如果人类再不行动，对自然仅仅说一声遗憾或者抱歉，那么，一百年后，巨大的热浪将会席卷地球每一个角落，海洋中漂浮的冰山将会融化得无影无踪。到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也许不会重演，但更为严重的全球性的悲剧将有可能不期而至。面对如此前景，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知、远见和气魄，采取坚实的行动，来弥补我们的前人以及我们自己对自然所犯下的

过错。保护自然，修复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应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果若如此，新世纪的人们将会迎来新的希望，人类文明将会走向光辉的彼岸。

参考文献

【1】车尔夫，《人类古文明失落之谜全破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2】《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

（曲格平：环境科学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原文链接 ftp://124.42.15.59/ck/2011-04/100/152/180/442/%CE%C4%C3%F7%B5%C4%CB%A5%B0%DC%D3%EB%C6%F4%B5%CF.pdf）

【返回目录】

9-7 张兢兢：环境公众参与的困境



“现代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政府需要公众参与来保证公共决策的正确。科技的发展使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政府公共决策的目标应当是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且管理风险。公众参与也是避免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社会冲突的有效方法，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公众参与，作为公民和环保团体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一种尝试，在 2004 年前后，曾经是环保领域一个热门词汇。当时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圆明园铺膜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有史以来第一次组织环保团体、公民个人参加的听证会。而五、六年过去，“公众参与”现在似乎热度已降，不复以前的热闹。而“公益诉讼”却成为日渐流行的词汇，不仅在环境保护领域，也在涉及消费者权益、妇女和农民工权益等领域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这些代表妇女、农民工、消费者的公益诉讼案件，反映的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已经对传统的诉讼制度提出了挑战。

这两个词汇，都代表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意识的萌芽和发展。这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词汇：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公益诉讼难以达到纠正政府错误或违法行政行为、保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如果没有公益诉讼，公众参与的行动就缺乏了法律救济手段，参与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无论是公众参与还是公益诉讼，以现实中发生的环境保护事件和案例来看，“公众”还是难免其花瓶的命运，“公益”也未必是指公众的利益，检察院、政府和政府的职能部门，争先恐后代表“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表—公众和环保团体，却还没有资格代表公共利益、代表被损害的自然生态而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而进入法院。

回顾一下近些年来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事件，我们可以对中国环境运动中的公众参有个清晰了解。

公众参与的典型案例

1. 2004 年北京电力公司“西上六”高压输电线电磁辐射污染听证会。

这个由北京市环保局召开的听证会，论影响力，虽然比不上之后的国家环保总局圆明园铺膜防渗工程听证会，但这是 2004 年 7 月 1 日《行政许可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生效后召开的第一个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听证会。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批行为，是行政许可的一种，适用《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而且在听证会后，由参与听证的公民向法院提起了诉北京市环保局的环境行政诉讼。就公众参与的突破性和参与形式的完整性而言，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圆明园湖底铺膜事件。

这条高压线是北京电力公司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违法开工建设的项目，不仅因为临近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而影响其景观，而且高压线沿途的 10 多个居民小区和教学科研单位也将受其电磁辐射的影响。

2004 年 8 月 13 日，北京市环保局召开听证会，对北京电力公司提交的补办环评报告，就该高压线项目是否产生电磁辐射污染进行听证。北京市环保局认可了北京电力公司补办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而这份由北京电力公司聘请环评机构、支付环评费用的报告，毫无悬念地确认该高压线工程对“周围公众的影响是小的，公众安全是有保证的，项目可行”。

对这么一份匆匆赶制出来、带有明显瑕疵的环评报告，百旺小区的六位业主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申请被驳回之后，2005 年 4 月又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北京市环保局对该报告的行政审批决定，由此开始了持续 4 年的诉北京市环保局行政

诉讼。该案被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拖延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才审结，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不支持六位业主的诉讼请求。而此时，当年的违法工程”西上六”高压线已经建成、投入运营四年之久。

2.2005 年圆明园铺膜防渗工程事件：

2005 年 3 月 22 日，学者张正春在游览圆明园时发现工人正在湖底铺设防渗膜，于是通过人民网发表了《圆明园铺设防渗膜是毁灭性的生态灾难》一文，其他媒体随之进行了集中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4 月 1 日，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责令圆明园管理处停止湖底铺膜的施工，委托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补办环评报告；在该通知里，专门做出了要对该项目的补办环评报告召开听证会的决定。但该听证会实际上在通知做出不久后的 4 月 13 日、并未等待圆明园管理处补办好环评报告就在北京召开了。

和前面的高压线案件相同，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也是一个完全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违法开工建设的项目，而违反法律的项目业主—圆明园管理处和上述第一案件里的北京电力公司一样，无论在听证会召开的前后，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没有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31 条对于这类违法情形仅仅要求建设单位补办环评，这样“温柔”的规定为这类的违法行为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条件，完全破坏了环评制度“防患于未然”的制度价值，是必须加以修改的条款，否则环境影响评价将不具有存在的意义。

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第一个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听证会。其后至今的 6 年间，还没有任何一个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听证会能超越其影响力。当时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环保领域的许多重大事务，与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公益性特点，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人民群众对环保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不仅是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步的重要体现。”

听证会之后怎么样了？听证会上，公众的意见表达了、政府部门也“听到”了，公众意见是否被考虑、采纳了？之后的故事看起来比较完美：清华大学接受委托、为铺膜工程所做的《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在 7 月 5 日得到了环保总局的批准，环保总局亦

责令圆明园管理处根据该报告做出整改。

圆明园事件成为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启蒙性事件，虽然听证会的召开、议事方式和环保总局其后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处理并不完美，但也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由政府主管环境事务的最高行政部门来组织听证会。

圆明园听证会的第二年，2006 年的 2 月，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3.2007 年厦门 PX 项目

厦门市海沧 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是 2006 年厦门市欲引进台资建设的、厦门“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2007 年 3 月两会期间，由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发起，105 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提案，认为 PX 项目离居民区太近，如果发生泄漏或爆炸，将危及厦门百万人口。但厦门市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反而加快了 PX 项目的建设速度。这一事件成为当年“两会”热点，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强烈关注，并于 5 月下旬达到了高潮。6 月 1 日，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联系起来的数万名激愤的厦门市民“上街散步”，表达反对意见。6 月 7 日厦门市政府宣布，海沧 PX 项目的建设与否，将根据全区域总体规划环评的结论进行决策。同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将对厦门市全区域进行规划环评，包括 PX 项目在内的重化工项目都将根据规划环评的结果予以重新考量。

2007 年 12 月，厦门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确认该地区不宜兴建大型化工项目。厦门市政府组织了该规划环评报告的听证会。12 月 17 日，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做出将该项目迁址的决定。

有媒体说这个事件体现了“民意的胜利”，但“散步”这种民意的表达方式在中国以后的环境事件中几乎没有再次使用的可能，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执政党最高目标的今天。厦门市政府是在特定的情形下、以特殊的程序被动地接受了公众的参与，这种公众参与的形式并未写在 2006 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里，《办法》规定的公众参与的程序和

方式也在现实中遭遇了挑战。

4.2007 年值得一提的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事件，还有北京市六里屯居民对北京市环保局做出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评报告的审批决定，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理由是该项目选址不当和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人数、范围不当，要求撤销该审批决定。环保总局于 2007 年 6 月做出了复议决定：“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全面公开论证过程，扩大征求公众意见范围。论证和征求公众意见的结果必须报送北京市环保局核准并发布公告，然后报国家环保总局备案。在公告和备案之前，该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公众参与的困境

上述四个公众参与的事件，其中三个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公众希望的目标：可能污染环境的工程，或缓建、或被责令补办环评手续并整改、或迁址。但是，更多公众要求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而不能如愿，比如 2008 年中石化在四川省彭州市的乙烯项目，众多成都公民参与其环评过程的愿望被无情地拒绝；即便是获得了一定成效的公众参与事件，也反映了这种参与式民主形式在中国环境事务中的困难：

第一，都是事后的参与。公众无从了解项目审批和建设的完整真实信息，基本是偶然发现项目“不合法”或“不合理”，而此时的项目，要么未作环评却已违法开工，要么环境影响评价已在公众参与不充分的情形下结束。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公民基本无从了解，更别说参与了。

第二，被动的参与。这四个公众参与事件，是在公众“上街散步”、媒体网络广为曝光之后，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才不得已组织听证会。在环评报告的编制和审批环节，政府并没有主动邀请公众参与。

第三，公众参与的程序性规定不科学，无法让公众充分表达意见。比如百旺居民对高压线项目和六里屯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评报告提出质疑，一个原因就是认为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人数过少、选取的公众代表不具代表性。2006 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有对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些程序性规定，但在实践中适用效果并不好。特别是作为公众参与前提和主要内容的信息公开，2008 年之前法律并没有规定，2008 年之后有了法律依据，但法律执行的效果实在令人难以恭维。公众往往无从获得真实而全面的信息，而没有这样的信息，公众无法有准备地、理性地参与政府的行政决策。

让我们看到一些改进的是，环保部已经着手制订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与》，并于 2011 年 1 月向公众征集意见。这个技术导则对公众的定义、公众参与所必须的信息公开的时间和方式、论证会、听证会召开的条件等公众参与的程序做了规定。希望这个标准能形成有利于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规则。

第四是这种参与是缺乏法律救济的参与。法律谚语说：“无救济无权利。”公众参与环评是《行政许可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在权利被侵害后，如果公民不能通过司法途径保护其权利，权利就仅仅停留在书面上。《环境影响评价法》对于公众参与，仅有一条抽象而简单的规定，即“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并未规定环评单位未征集公众意见而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也是众多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编制环节并无公众参与、或公众参与的程度无法达到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如果公民或环保团体申请参与环境政策的决策却被政府部门拒绝，现行的法律里没有给他们以诉权到法院提起诉讼。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比如，如果圆明园铺膜事件的第一发现人张正春或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对国家环保总局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满，他们都会因为和圆明园铺膜工程环评报告的审批行为没有利害关系而没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欠缺诉权的保障，也是公民或环保组织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重大障碍。

2008 年 5 月 1 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生效，原本给了环保团体和公众以巨大的希望，以为环境领域的参与式民主进程迎来了春天。但

是，三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差强人意。作为公众参与前提条件的环境信息公开的状况都如此，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类似于圆明园这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众参与事件，再未出现。

因为遭遇上述的障碍，中国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动力似乎在减弱。但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政府需要公众参与来保证公共决策的正确。科技的发展使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政府公共决策的目标应当是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且管理风险。公众参与也是避免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社会冲突的有效方法，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们希望看到《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这些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法规不再挂有“暂行”“试行”的字样，希望政府掌握的环境信息能真正和公众共享、希望法院的大门为环保团体和公众而打开，这样，环境问题给社会带来的风险才可能降至最低。

（张兢兢：公共利益法研究所中国项目副主任。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414）

【返回目录】

【鉴】

9-8 卢思骋：匍匐前进的台湾环保运动



“从保卫家园的悲情抗争，到社区营造的细水流长，从鹿港反杜邦，再到遍地反国光，走入而立之年的台湾环境运动，走过激情，穿越幽谷，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抵抗与建设的张力中，始终匍匐前进，重塑台湾的永续未来。”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全球各地都有民间团体举办各式活动，呼吁民众关爱地球。最值得庆祝的，应是台湾的环境保护团体。今年地球日，12 个环保团体与马英九会谈，提出民间环保运动的多项绿色建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要求政府撤消“国光石化”案。马英九会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的开发，为台湾民间环保运动的重大胜利。

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

台湾国光石化公司于 2005 年提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计划庞大，包括多间炼油厂、烯烃厂、芳香烃厂及中下游工厂。因为未能通过环评，2008 年提出转移到彰化县。原定投资新台币 9，336 亿元，后来修正为新台币 6，325 亿元。

这项台湾近年少见的大型石化投资开发案，过去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遭受环保运动和

彰化居民的强烈反对，民间抗争，加上朝野互动，民众的呼声摇撼决策过程，近日环评专家小组会议中，有近八成专家委员表示国光石化不应开发，最终迫使马英九响应民意，宣布不支持该开发案。

环保组织认为，国光石化不单可能带来污染，而且选址不当，建成后将会严重破坏生态。首先，预定开发地彰化大成位于浊水溪口，是国际级湿地，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价值高，在此地兴建污染性的石化工厂，实属不智。其次，彰化县地表水缺乏，居民生活和农业用水长期仰赖地下水源，全县自来用水量 98%都取自地下水，而国光石化一天的用水量，预计将超过整个彰化县。于高度缺水地区兴建极为耗水的化工业，对极为紧张的水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根本不可能持续，有环保专家一针见自地提出“请问水要从哪里来？”。

其三，国光石化将危及濒临绝种的中华白海豚。科研人员在 2004 年于台湾海峡东岸发现了一个中华白海豚族群，但估计数量少于一百头，相当脆弱，2008 年时国际保育联盟(IUCN)将其划为“极危”，若然不加保护，短期内有全部灭绝之虞。国光石化的预定兴建位置，正处于这群中华白海豚之栖息范围，若然建成，恐怕会使其加速绝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石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竟还补贴支持设厂，非但浪费公共财政，更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伤害。多年来，环绕国光石化案的讨论，事实上经已上升到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以及人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这两条政经主轴，其实也正是“可持续发展”(台译“永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台湾环境运动在反国光石化案中提出的口号：“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也直接扣连上可持续发展，以及台湾之未来。如此设定讨论的框架，朝野两党自然难以拒斥。

从保护家园到社区营造

事实上，“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这个口号，正好总结了台湾民间环境运动去三十年

来的发展轨迹。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丘昌泰教授提出了台湾环保运动发展的四个阶段，以下按这个框架加以综述：

第一阶段：保卫家园行动的萌芽阶段（1970-1986）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以农业培养工业，扶植外销导向的经济体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南并列东亚四小龙。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 1982 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面对环境的恶化和政府的漠视，台湾各地民众争相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的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像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随着抗争的漫延，早期相对孤立的地方性组织，逐渐汇合成县市级的组织，例如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等，使民众的邻避意识(NIMBY 即反对在我家后园污染)慢慢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环境价值和集体行动。

1986 年彰化县的鹿港反杜邦运动，将自力救济运动推向高潮。化工巨头杜邦计划六十四亿元台币，于彰滨工业区兴建大型二氧化钛厂，当地居民尤其是参加地方选举的政治人物全身投入反杜邦设厂，翌年杜邦宣布放弃计划。鹿港市民反社邦的同时，世界各地民众的环保意识，也正因为印度波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意外等巨型环境灾难而大大提高。鹿港反杜邦，也被视为台湾环境运动之滥觞。(注：近年杜邦积极推动在山东东营市兴建的二氧化钛厂，正是当年鹿港居民所反对的工艺。)

第二阶段：保卫家园行动的颠峰阶段（1987-1991）

1987 年反杜邦运动的成功，刚好接上蒋经国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解除报禁、党禁，战后二二八事件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以迄备受压制的社会力，终于井喷式总爆发，台湾民主政治

急速发展，妇女运动、工会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公民全面参与社会改革的大潮，环保运动乃其中的中流砥柱。

全岛各地的反污染抗争如雨后春笋，一方面环绕大型石化工业区而动员抗争，例如宜兰县反六轻、后劲反五轻、高雄林园等事件，在在体现出环保运动锐不可挡的势头，另一方面，苏联核灾后台湾民众也开始提出反核主张，先后有外岛兰屿居民反对倾倒核废料、台北县贡寮乡民反对兴建核四厂等。这些地方性的抗争，都成为了当时的全岛性议题，牵动台湾民心，成为社会发展何去何从之讨论焦点。

新兴的政治力量民进党，亦开始积极参与介入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的兴起，亦加强了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面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党国资本主义，环境运动当时与反对党发现了共同敌人，自然地形成了同盟军，在许多的议题上合作无间，但也种下日后政治力量吸纳社会运动的开端。

第三阶段：保卫家园运动的转型阶段（1992-1999）

1992 年联合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高峰会，多国签定了多项多边国际环境条约，涉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森林保护、荒漠化等诸多问题。环境议题的全球化，使得”地球村”的概念得以普及，地方性的反污染，逐渐连结到保护地球、守卫人类家园等普世论述，并从而得到更高的社会正当性。

台湾环保团体也开始专业化、职业化，展现出更强的调查与分析能力，成熟地运用媒体策略和政治游说，开展更深入的环保教育和更有效的环保动员。环境运动亦开始与其他运动结盟合作，与妇女运动的联合，就催生了主妇联盟这样的女性主义环保组织，以消费者共同购买为核心，推动妇女参与环保；与劳工运动的合流，则影响了许多青年环运动者，环绕在当年民进党内左派的”群众”杂志社以及台湾环保联盟台北分会，形成一鼓红绿合流的左翼力量，在反核、反焚化炉等议题上影响深远。不过，与反对政治的靠近，则难免影环保运动本应持有的独立自主性格；另一边厢，以台湾独立、群众运动路线以及社会民主为纲领的民进党新潮流系，积极吸纳收编环保运动等社会力量，为其执政铺路。此其时的台湾环境运动，成为亚洲地区中

最具政治穿透力和社会支持度的运动之一，与印度、南韩的环境运动成三角之势。

九十年代初，台湾政府提出兴建大型水电站，促成了南部的客家人聚落地美浓乡的反水库运动。当地的乡绅和许多返乡知识青年，组成了美浓爱乡协会，结合生态保护、农村生活、客家文化认同、新文化运动(例如林生祥的音乐实践)，别开生面，打开了新的运动想像，开启了台湾的社区营造之先河。

第四阶段：社区营造运动的崛起(2000 至今)

2000 年台湾实现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正式消解了国民党战后在台的威权统治。不过，借助环境运动等社会力量登上权力高峰的民进党，上台后并未有贯彻落实其环保政策，原本主张“非核家园”立场，在政治现实下软弱无力，“存在决定意识”，当政后的民进党亦越发向资本倾斜，毫不掩饰其增长至上式发展主义信仰，与前朝无异，使许多人环保人士寄望落空，理想幻灭。

环保运动在九十年代全盛期时其实亦未有把握机遇，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扎根民间社会，向市民措募资金，建立与民众的资源收集和双向反馈机制。民进党入主政府，也卷走了一整代的环保运动干部进入各级机关工作，使环保组织人材更形凋零。二千年后，环境运动陷入低迷困惑。此起彼落，取而代之的正是美浓反水库运动开启的社区营造运动。

千禧年前后，朝野两党为了极建立自身的社区基础，让政权从基层开始建立，不约而同地支持社区营造运动，从文化、教育、治安、福利、卫生和环境等六方面营造美好杜区，促进公民社会，提高市民生活质素。1998 年文山社区大学成立，成为第一所属于平民大众的社区大学，揭开社大运动序幕，至今全台共有近百所提供成人教育和社区营造的社区大学。环保意识高涨的公民，开始反对台湾各地的垃圾堆埋场和焚化炉计划，环境团体积极参与垃圾大战，在政策层面上促使台北市政府开征垃圾费随袋征收；然而，作为解决方案的垃圾减量和社区资源回收，推动了环境运动的社区化，为社区营造运动推波助澜。

迈向下一个十年

假如说 2000 年前，也就是政党轮替前，台湾环境运动的主题是保护家园，那麼千禧年后其主调则是社区营造。保护家园建基于被污染者受害意识，以自力救济对抗公害污染，争取迁厂赔偿，是消极的、防御性的的运动阶段；社区营造则以环境意识为出发点，进取地建构新的社区身份认同，倡导绿色价值，让环境运动迈向全民动员、积极建设的新阶段。

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何明修 2006 年出版的专着《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以“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为分析切入点，提出过去二十年台湾环境运动的发展与岛内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政治动员的诸多机会，前者则反过来推动了后者的深化发展。他认为，环境运动乃“追求环境正义的集体行动和绿色民主力量”。何明修通过分析后劲反五轻、美浓反水库和贡寮反核四等几个案例，提出环境运动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相对自主”较高，则运动较易成功，若“相对依赖”较高，则较容易受制于政党利益，阻碍运动目标之达成。

何明修此书颇受争议，一些资深环境运动者质疑其田野研查不够扎实、资料处理粗疏。不过，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理想挫败，台湾环保运动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虑其社会定位和历史任务。

曾经是政府环评委员的李根政，不愿沦为“橡皮图章”，于 2007 年辞去近二十年的教职，决意全心投入环保运动组织经营，创立“地球公民协会”，面向社会募资，以市民个人捐款推动环境运动。去年，李根政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台湾环境 NGO 的下一个十年〉文章，语调沉重地指出台湾许多 NGO 都面临了经营困境，因为“目前许多环保团体的运作是仰赖政府的委托案，从中节省开支勉力支撑。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靠政府的补助，既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消耗了有志之士的热情，使得人才总是留不住，经验也很难累积，陷入了极糟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环保团体，或许偶尔可以虚张声势，但无法发挥持续的影响力。”以李根政为代表的新一代环运领袖，痛定思痛，默默耕耘，力求突破困境，走出独立于政党政治、根植民

间的环运新路。

2005 年起，因兴建台北捷运而面临折迁的乐生疗养院，意外地引发了大批青年投身保育运动，自发组织青年乐生联盟，加入抢救古迹。这些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社运青年，近年又发起了保卫集会权利的野草梅运动、反对兴建苏花高(苏澳至花莲高速公路)、以及提出土地正义的台湾农村阵线等多场运动，以创新的文化艺术行动、社交纲络动员、以及超越蓝绿的新世代姿态，为环运补充了面向未来的新血。

就这样，台湾环运重新上路。李根政人等老干部和八零后生力军联手推动的反国光石化之胜利，被视为近年台湾环境政治博弈的转戾点。马英九表态不支持国光石化之后一周，我获邀到台湾各地与民间环保 NGO 交流，主持了多场工作坊，接触了许多环境运动参与者和核心干部，当中大部份人认为，打败国光石化具有划时代意义，意味环保运动终可力挽狂澜，使主导发展的政府也要臣服于民间的环保呼声，而永续台湾的论述，将日渐成为新的朝野共识，一些资深运动组织者甚至嗅到，环保运动正在跨越停滞的门槛，反守为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至此，台湾环境运动再次走在亚洲之先，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台湾环境信息协会、台湾妈祖鱼保育联盟、荒野保护协会、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中华民国野鸟学会、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等多个环保组织发起”全民来认股守护浊水溪”信托行动，组织民众认股，组成民间财团，以人民财力”买起”大城湿地，阻止国光石化开发，至今已有 7 万多人响应，贯彻台湾环保运动多年来取信民间、自力救济的传统。

面对民间环保运动的强大动员和创意招式，马英九政府进退失据，不单国光石化前途坎坷，应当下马，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台湾社会的未来发展，自九十年代以来重新激化的民间社会运动，成功重夺想象，主导讨论，抛出了永续发展的方向，朝野两党只能被牵着鼻子，被动响应。

从保卫家园的悲情抗争，到社区营造的细水流长，从鹿港反杜邦，再到遍地反国光，迈入而立之年的台湾环境运动，走过激情，穿越幽谷，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抵抗与建设的张力中，始终匍匐前进，重塑台湾的永续未来。

（卢思骋：创绿中心、前进工作室创办人，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返回目录】

9-9 何海宁 倪晓雯：超日之思（上）-日本的全民洁癖如何炼成



“日本社会环保意识得以固化并传承，这得益于日本‘四大公害’造成工业污染的教训，得益于不断完善的法律，得益于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的国民性格，这使得整个社会如同工业流水线一般程序化运作。”

在四十余双眼睛的注视下，65 岁的村井安成老师要在学生们面前变“魔术”——他要把烹饪台上的苦瓜变成一个个“甜甜圈”。

苦瓜是这些四年级小学生们春天种下的，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苦瓜生长时，7 名小学生还利用垂下的藤条，制作“绿色窗帘”，在教学楼外面遮挡阳光，降低室温。环保烹饪课前，这些小学生站在讲台上，举着室内外温差记录表，讲述他们的成功实验。

这是位于东京新宿区东户山小学综合学习时间的一项内容，帮助学生亲近大自然。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每周两小时，让小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调查内容。

“有 30%多的学生选择环保。”位于东京的环境保护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说。

与中国环境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更倾向于“体验”。这种环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为此，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一块田地，学生们种植水稻；有的则带领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参观废品回收发电的过程。“这样，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森良说。

东户山小学校长国分重隆在记者面前摊开一份详细的课程安排计划，每个科目都有环保内容。“最难融入的是数学。”他说。即便如此，老师也设法让学生在校园里各自找一棵树，自己计算树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与记者谈话间，他便接到一个环保组织的电话，向他推荐在工业课、农业课里融入环境教育的活动。

现在，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制定环境教育大纲，各个地区的教育机构进

一步细化，到了国分重隆手里就是详细列举每个科目、年级和学期的具体活动表。

“日本人对环保的要求已经根深蒂固了。”国分重隆指着手里的文部省的“环境教育指导资料（小学校编）”感叹道。

那一场日本教育大辩论

当了 40 年教师的村井安成如今在东京都新宿区立环境学习信息中心工作。这所民间组织类似于环境教育的中介机构，负责登录环保组织信息，然后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区各个学校推荐。

村井安成的办公室色彩斑斓，摆置着许多小学生作品，有环保小屋的模型、昆虫标本，还有一个太阳能收集器。一块展板上贴满学生日记，其中一张记着：“今天在电车上，我看到有人穿长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装。这在夏天是很不合适的，浪费空调。”

这所信息中心隶属于新宿区政府的环保部门，通过招投标合作，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多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在全日本，这类非盈利组织有数千所。

环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这源于 1990 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大辩论：日本教育缺乏什么？争论的最终答案是，日本学生记忆很拿手，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从各个科目中削减了上课时间，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这恰恰给起步的环境教育提供了载体。

1980 年代中后期，日本正经历着著名的经济泡沫时期，股票和土地交易市场盛行投机热潮。“所有人都觉得做什么都能成功，房贷利息 6%都觉得能还，现在 2%都不敢买房子。”38 岁的东京妇女早川美妙子说。

如今司空见惯的企业环保广告，当时几乎没有。一名东京市民唯一记得的是一家地铁公司做的环保广告，它将塑料瓶变成纤维，制成员工制服。

经济崩盘之后，日本开始反思。这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转变，教师、学者开始专注于环境教育。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 1992 年日本环境教育论坛成立。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论坛前身是清里论坛。1987 年，在距离东京市区约 2 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清里召开了第一届环境教育论坛，这成为全国各地教师、学者交流的平台。

日本环保启蒙运动

9 月 15 日，学习院大学教授走访哲郎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教科书，其中一本是几年前的小学课本，上面没有现在热门的低碳、地球环保知识，而是讲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业污染。

四大公害指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发于 1960 年代，这是日本环境污染时代的标志。

1970 年代，公害病的医学认定工作持续多年，受害居民和企业激烈对抗。虽然四大公害只发生在日本偏远地区，但抗议活动和随后旷日持久的诉讼震撼了整个日本。

村井安成的高中时代正好是水俣病诉讼激烈的时候。当时他的课本并没有相关环保内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会痒。”

10 年之后，当法律认定企业责任之时，村井安成从学生变成教师，课本上也开始出现了公害教育。

在这期间，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国民性使得自然保护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特别在都市圈快速发展期间，普通市民更加渴望亲近自然。一种“自然学校”的民间组织、企业开始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

如今，“自然学校”被赋予了环保理念，有解说者专门进行环保宣传。“七八年前，自然学校有两千多所，现在有四千多所了。这意味着家庭与自然接触的意愿在增加。”走访哲郎说。

既是法律，又是文化

对于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染野宪治更愿意相信是环保法律确立所致。这名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原来在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环保部）就职，参与水俣病赔偿工作。他拿出一张带有坐标系的讲解稿，纵坐标是时间，横坐标代表从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变。时间越靠近现在，带有鼓励、促进性质的自主性法律越多。

从 1967 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 1993 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项环保法律经历了政府、

民间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类环保法令和产业标准都比较完备，连保鲜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属锯条，都有企业更换为更加有利于垃圾分类的代替品。最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类，种类区分在各地不尽相同，但每个地方至少能看到 5 个并列摆放的垃圾桶。这已具体到了每一个饮料瓶上。制造商要标明可回收标志，瓶盖、瓶身、包装纸分为 3 类垃圾分别回收。为方便消费者撕下包装纸，生产商还特别制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开始有规范，企业也开始遵守，人们才慢慢了解环保。”村井安成说。

环保正成为企业促进消费的招数。屋顶绿化成为潮流，就有商家开始广告推荐大象粪便是绝好的肥料。有人在看电视时会走开或者不知不觉打瞌睡，就有生产商开发了可以感应观众是否在场，或者是否睁眼的电视机，就算闭眼睡觉了，电视机都会自动关闭。

“企业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正面影响。”家住东京高尚住宅区的园山京子说，“比如买冰箱、空调，就会注意不含氟利昂。”

“环保意识现在是一种 fashion（潮流）。”爱知大学教授大泽正治说，大概 5 年前，他在欧洲看到环保袋时，就感觉这将会风行日本。如今，这果真已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潮品”。

矛盾的环保社会

早川美妙子家里有 10 个环保袋，几乎每买一宗商品都会送一个，这成了浪费的环保品。“商店里也卖环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变成商品了。”她笑道。

仔细观察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会令人心生矛盾。无论谁踏足这里，都会赞叹它干净的街道、精细的垃圾分类。不过，当入夜时，看到满街密如丛林的霓虹灯整夜通明，商店里精美包装的商品，又会纠结于这个消费社会的奢侈浪费。

许多垃圾桶放在饮料自动售货机旁边，与数十种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 年日本制定了“包装容器回收法”，认为塑料瓶的回收技术已成熟，允许企业生产 500 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回收。”广濑稔也说，“这是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广濑稔也住在横滨市，家里垃圾分为 8 类，牛奶纸盒必须剪开、洗净、摊平，才能送去回

收点。这个过程要用水电，他与一些家庭妇女一样迷惑，这到底是环保还是浪费？

马桶是另一个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马桶水箱的进水口是水龙头，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环用于冲洗马桶。它同时有舒适的额外设置，方便之后有喷水口冲洗肛门，马桶圈会常年通电发热，保证如厕人士裸露的屁股不着凉。这显然有些不环保，于是，有商家生产了感应发热的马桶，避免无人时的“浪费”。

许多餐厅提供一次性筷子、餐巾纸。如果发给顾客 4 张餐巾纸，只用了 1 张，但是最后清理时，严谨的日本餐厅会扔掉所有餐巾纸。

“日本人做的努力，是在生活便利性之上的环保，这并不是为了减少消费。”染野宪治斟酌了一下字眼，慢慢说道。

走访哲郎有时会哭笑不得。在一次大学三年级测试上，有 30%的大学生不会把英语的“生物多样化”、“全球变暖”翻译成日文，在小学学习过的蜻蜓、苍蝇幼虫，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日本的环保意识整体是很高的，但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有一些‘宅族’，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像我们这个年纪，公害病感同身受，但相比较年轻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环境教育，应该更加有活力，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村井安成说。

（何海宁：《南方周末》记者。倪晓雯：《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原文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135）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傅若兰：在中国起诉污染者的艰难之路

近日，首都北京发生的雾霾污染天气引发网友热议，环保再度成为热点话题。近十年来，中国环境污染纠纷的数量不断上升，将其纳入法治途径无疑是正确的解决之道。那么，环境违法案件的诉讼在中国是如何进行的，从纠纷到判决的过程又是如何？

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司徒蕾（Rachel E. Stern）最近在学术杂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从纠纷到定议：在中国起诉污染者》一文。文章以 2003 年福建省屏南县榕屏联营化工厂污染反弹案切入，展现了中国环境诉讼的全过程，考察中国环境法律及机构如何运转，起诉者和律师如何克服各种障碍，打赢官司，获得赔偿。

司徒蕾于 2006 年 11 月到 2008 年 1 月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采访对象超过 130 人，包括中国环境违法案件的起诉人、律师、法官及其他熟知中国环境诉讼的人士。通过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司徒蕾从“立案前”、“审理中”和“法庭之外”三个阶段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环境诉讼的全过程。

“立案”是起诉者面临的第一个难关。立案庭常常以“行政管理和干预更适用于该纠纷”为由拒绝立案要求。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院追求诉讼费和审判案件数量的最大化，本可以通过代表人发起集体诉讼的案件往往被拆分为若干个案件，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起诉者的负担。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同样增加了立案的难度。在律师方面，请不起律师对日益富裕的中国农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是环境污染案件的潜在政治敏感性及起诉的高难度，常常让律师们望而却步。

在案件审理阶段，《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中有两个关键性规定：第

一，即使排放符合国家标准，污染者仍需对其造成的损失负责；第二，证明自身污染没有造成损失为被告的责任。因为很难从正面证明损失由污染造成，这一规定对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意义重大。但是，取证难的现状仍然存在。原告及其辩护律师往往要花费极大精力寻找权威机构进行污染鉴定，并且损失往往很难确定和量化。进入审理阶段后，律师们在代理词上精雕细琢，常常通过强调原告的弱势群体身份及污染事件的社会危害严重性博取法官的同情与认同，甚至以鼓励法官“创造历史”的方式试图获取诉讼胜利。

“法庭之外”的任务也不轻松。为向法院及政府施加压力，起诉者及其辩护律师会竭尽全力寻求媒体及公共舆论的帮助，同时也通过与政府、司法系统的内部“关系”，推动案件审理进程及判决结果的执行。但在解决这些所有外部困难的同时，维持原告方内部的团结一致成为更大的挑战，这不仅包括起诉者之间，也包括起诉者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关系。

不可否认，中国环境违法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存在众多拦路虎。但司徒蕾在结论部分强调，法治进程正在缓慢曲折地前行（creakforward），在不同的诉讼领域，乃至不同的地域，进展都显示出典型的不均衡现象。而这一进程仍处于快速变化的时期，值得跟踪关注。

参考文献

RachelE.Stern，FromDisputetoDecision:SuingPollutersinChina，TheChinaQuarterly，Vol.206，Jun2011，pp.294-312.

【返回目录】

【FMN 新闻专栏】

丰县校车事故

就在中央政府刚刚推出校车管理条例意见征集稿的第二天，12 月 12 日下午六时许，江苏徐州市**丰县**首羡镇，一辆载有数十名学生的校车在送学生回家的路上翻入河中，截至 13 日凌晨 2 时许，官方称已有 15 名学生死亡。

新闻：http://cn.fmnnow.com/?p=1366

http://fmn.cc/srSsv0

12 月 13 日江苏**丰县**政府连开两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事故经过及伤者抢救情况、事故初步勘验情况、以及全力做好学生家长的情绪稳定工作等内容。不过发布会仅 20 分钟就草草收场，而且学生家长不能探望自己的孩子。当地采访的记者描述了他们所见到了当地掩埋真相的种种做法。

新闻：http://fmn.cc/tNlhkA

http://cn.fmnnow.com/?p=1382

对于车上学生的具体数字，很多参与救援的村民表示江苏丰县校车中学生多达 60 多人而且当时就“有二十多个不怎么动了”。但**丰县**交通局回应一切以官方数字为准。脱险的学生表示当

时 2 个座位要坐 5 个人，连过道都站满人，同时有学生还被学校告知不能随便说话。

新闻：http://fmn.cc/sGQEGI

http://fmn.cc/vlq66T

http://fmn.cc/u31YAM

江苏**丰县**人民政府 14 日下午召开校车侧翻事故以来的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丰县公安部门突然改口称，根据司机交代，事故发生时车上学生有 47 人，而公安部门能够确认的人数为 41 人。事发至今，车辆上实际人数和死亡人数至今仍是谜团。

新闻：http://fmn.cc/rCOrPb

http://fmn.cc/tqkuzH

（更多关于校车的讨论，参见 1510 周刊第 37 期《校车安全谁担责？》）

乌坎村事件

广东陆丰**乌坎村** 9 月 21 日的村民维权的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官方 12 月 9 日通报处置情况，并称“有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同时还拘捕了一些组织者，并要取缔村民自发成立的管理组织。官方的说辞和做法引起了民众的热议。

新闻：http://fmn.cc/vM60qX

12 月 11 日清晨广东陆丰**乌坎村**村民同数百警察在村口对峙，警方声称是清障行动，并对村民使用了水炮和催泪弹，乌坎村民通过鸣锣的方式保卫村子，不过警方在清晨 7 时左右离去。

新闻：http://fmn.cc/rAQxA6

http://fmn.cc/uLQwZv

同样是 12 月 11 日晚间，广东陆丰**乌坎村**临时代表副会长**薛锦波**被官方羁押第 3 天时死亡，官方称是猝死，不过村民并不相信。12 月 12 日下午广东陆丰乌坎村村民悼念薛锦波，村委大楼被挂上白布，人们聚集在村内高喊口号，当日有记者前来采访，村民们集体哭诉冤情。同时 11 日陆丰市数百教师到教育局上访，可能这也是当天早上警察突然撤走的原因。

新闻：http://fmn.cc/ty7MSw

http://cn.fmnnow.com/?p=1357

广东汕尾**乌坎村**村民 12 月 12 日为防止警察进村抓人又架设路障，警方则派人把守村子的主要道路防止村民出村示威。同时 12 月 13 日广东乌坎村的村民再次举行全民大会，悼念在警方羁押期间不幸去世的薛锦波先生，村民们十分悲伤且激动。

新闻：http://fmn.cc/vSnoV8

照片：http://fmn.cc/vhI4rg

http://fmn.cc/tpAabc

由于**薛锦波**在羁押期间莫名死亡，且官方说辞令人生疑，而且有消息指另外四名被羁押村民也



被用刑，广东陆丰政府发消息称张建城、洪锐潮、庄烈宏、曾昭亮四名村民家属 12 月 13 日去探望了他们，幸好并无大碍。官方表示对薛锦波的整个审讯、羁押过程都有全程录音录像，但是我们还未找到官方发布的视频资料。

新闻：http://fmn.cc/u26Apr

http://fmn.cc/v706j9

12 月 14 日**乌坎村**村民对 FMN 编辑讲述了乌坎村目前的状况，因为警察多日的封锁，虽未断水断电但村内缺少食物，希望能引起外界的关注。不过从外国媒体近日报道来看，仍有途径可以出入村子。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村内夜间守卫的均是年轻人，他们的能力不容小视。

新闻：http://fmn.cc/v7NFhJ

本周维权新闻

12 月 9 日有消息称**倪玉兰**律师获得了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不过她的家人 12 月 13 日再次决定推迟接受这一奖项，不过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没有受到外部的压力。

新闻：http://cn.fmnnow.com/?p=1397

西铁城代工厂冠星精密表链厂上个月的罢工行动引起多方关注，而工人们也成功达成了全国首例全程无官方参与的劳资谈判，工厂的上千名员工获赔七折加班费。

新闻：http://fmn.cc/unKRnj

浙江德清县企业**污染环境**，村民就此问题进行维权，反被检察院指控涉嫌敲诈勒索并被刑拘，12 月 9 日法院免予村民的刑事处罚，但未判无罪不过村民和律师表示将不会上诉。

新闻：http://fmn.cc/uDjy8s

近来中国的企业**罢工**事件不断，有媒体报道日本日立集团旗下的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工人停工已四天，因老员工认为轮休制度不合理且工资仅有千元，希望能为自己争取权利。而事件在 12 月 10 日发生升级，该厂的 2000 员工包围警察并发生冲突，有多名工人受伤。

新闻：http://fmn.cc/u8j82H

http://fmn.cc/sn4Dvx

河北省乐亭县 107 位渔民 12 月 13 日起诉**康菲公司**，以海上、通海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向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提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要求康菲停止侵权、消除危险并赔偿经济损失 4.9 亿余元。

新闻：http://fmn.cc/s2JXm5

其他重点新闻

12 月 14 日传来消息，美国《时代周刊》的 2011 年度人物评选中，今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编辑评选为年度人物第三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今年席卷全球的“抗议者”以及

指挥击毙本拉登的 WilliamH. McRaven. 链接中是对他的英文介绍。

新闻：http://fmn.cc/tmcsjM

12 月 9 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 2012 年中国将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共认为 2012 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对于楼市的调控政策也不会动摇，还特别强调了要保持社会稳定等内容。

新闻：http://fmn.cc/s8PlPo

12 月 12 日早上一名**韩国海警**在黄海扣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时被中国船员刺死，而韩国外交部则在当日召见中国驻韩大使，抗议中方船员刺死韩国海警一事。12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回应这一事件时称“表示遗憾”。

新闻：http://fmn.cc/vbhHdF

http://fmn.cc/tgwDXW

http://fmn.cc/sE87c0

12 月 13 日约 300 名韩国人到中国大使馆外进行示威，抗议海警被刺死。但是似乎中国也没有消停，13 日北京的韩国驻华使馆遭到钢珠袭击，玻璃被打碎，可能是用气枪射击造成。

新闻：http://fmn.cc/sWNg6k

http://fmn.cc/vyIVEb



“**电信联通**涉嫌宽带垄断”案中的两家企业提交中止调查申请后，有媒体发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官网上的承诺整改声明，已被悄悄改动，暗示自己未违反行业条例。13 日则有消息指发改委敦促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重交整改方案，认为此前的整改措施过于粗略。

新闻：http://fmn.cc/unR9YV

http://fmn.cc/tgs9Co

安徽、河南两省丙肝疫情持续已久影响范围广，河南终于在 12 月 11 日通报称永城市发现 103 例丙肝患者，官方称尚未发现不洁针具。而安徽的一妇女却因一家五口都被查出患有丙肝服毒自杀未遂，很多村民无法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

新闻：http://fmn.cc/rzgnSG

http://fmn.cc/rvng0g

上周的雾霾天气使得**北京**空气质量成为舆论热点，有专家表示近年来 PM10 的数据是下降的，但是 PM2.5 则是每年大概增加 3%至 4%。而且官方在标准制定上存在困难，有着标准提高就会导致空气达标天数下降的顾虑。

新闻：http://fmn.cc/rZd60Q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12 月 9 日对媒体表示，网络上很多淫秽色情信息，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惩处，于是“草榴时光”等 206 个微博客账号被依法关闭。

新闻：http://fmn.cc/uykfqu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表示，红会改革但是员工“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标准不会改变。改革引发地方机构不安，他们建议“暂缓改革”，而很多市县的红会还没理顺机制。

新闻：http://fmn.cc/tDy4nk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编辑：杨薛荟 黄雯怡

校订：刘垚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王琳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